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 | | | |
|---------|-----|-----|-----|
| 理 事 长 | 练知轩 | 黄如论 | |
| 副 理 事 长 | 林 锋 | 徐启源 | 高 翔 |
| 理 事 | 张苏飞 | 王华南 | 连国平 |
| | 黄文山 | 苏 忠 | |

《闽都文化》编委会

| | | | |
|-----|-----|-----|-----|
| 主 任 | 徐启源 | | |
| 编 委 | 赵麟斌 | 张苏飞 | 林 山 |
| | 陈章汉 | 王华南 | 连国平 |
| | 黄文山 | 武夏红 | |

《闽都文化》总第46期2016年第5期

| | |
|-----|--------------------|
| 主 管 |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 主 办 |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

| | |
|-----------|-------------------------|
| 出 版 单 位 | 《闽都文化》编辑部 |
| 主 编 | 张苏飞 |
| 执 行 主 编 | 黄文山 |
| 副 主 编 | 刘小敏 郭志杰 |
| 编 辑 部 主 任 | 曾建梅 |
| 编 辑 | 李铁生 王春燕 |
| 编 务 主 任 | 王 坚 |
| 编 务 | 康 芬 何财铭 |
| 装 帧 设 计 | 乔 麦 |
| 封 面 摄 影 | 王 坚 |
| 地 址 |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1号 |
| 邮 编 | 350005 |
| 电 话 | 0591-88302020 88302021 |
| 电 子 邮 箱 | minduwenhua@163.com |
| 网 址 | http://www.mdwhyjh.com/ |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 | |
|---------|-------------------|
| 杂 志 刊 号 | CN-35(Q) 第 0093 号 |
| 印 刷 厂 |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
| 定 价 | 12.00 元 |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13



尽兴而散

——玩物大家王世襄

P25



才女诗画聚和路

P30

百岁破布子树希望随想



在线读城

4 黄文山

城中山水

8 景 艳

浅呼深吸之间的“栈道表情”

闽都世家

13 陈美者

尽兴而散

——玩物大家王世襄

18 金建陵

清末名宦王仁堪与两位文学大师的祖父

21 郝 俊

王世真：握紧命运的缰绳

闽都名媛

25 孟丰敏

才女诗画聚和路

福地风采

30 邱泰斌

百岁破布子树希望随想

34 乔 梅

我的那棵小桑树

36 高 琴

荷塘盈盈吐芳沁

古文今读

39 戴云飞

黄文焕与姬岩

Contents

P76



一座有温度的岛屿

P81



琅岐的味道

P92

咫尺画幅天地宽
——檀东铿的扇面作品



闽都记忆

- 44 潘 亮 远去的鼠疫灾难
50 郭道鉴 诗钟和志社

榕垣旧事

- 54 林文政 金狮山恩仇录
59 游友基 陈衍、何振岱结怨之谜

双塔视野

- 64 宋祝平 吃在福州
70 陈 逸 谁解人间烟火味
——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烹饪教科书》

走笔琅岐

- 76 何 强 一座有温度的岛屿
81 林 山 琅岐的味道
86 文 净 幸有青山隔尘嚣

艺术档案

- 92 郑乃珖 咫尺画幅天地宽
——檀东铿的扇面作品
封二 檀东铿 佳色上花枝
封三 郑景贤 花鸟

城中山水

黄文山

人称福州的山水有两绝，其一是“城在山之中，山在城之中”，其二是“千家流水，百巷通潮”。

城中山水，使美丽的福州城市充满了诗情画意。

先说山。福州附郭的大山，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北有莲花山，南有五虎山，四面屏蔽，呵护得福州风雨不惊。福州人抬头见山，那一脉青翠，一不小心就扑上眉梢了。尽管城市天天在生长，但四面云山，却是她永远不变的背景。这便是“城在山之中”之谓。而城区中更错落着、隐伏着十数座玲珑剔透的小山。民间因此流传着

“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美丽俗谚。

这该是福州城市引以骄傲的独特景观。从空中俯瞰，可见城区三山耸翠，一水中流。这兀现的三山便是屏山、于山和乌山。三座山中，最高的乌山不过84米，最低的于山还不到60米，像是天造地设的三座巨大的盆景。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之中，有了这三座润碧湿翠的小山，物化的世界便平添了许多自然的野趣。

三山中，乌山最见清幽，自唐代起即为游览胜地。这里不仅怪石嶙峋、古榕参天，风景绝佳，而且遍布摩崖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的篆书“般若台”，是我国仅存的四





于山榕寿岩



乌山道山亭



乌山摩崖石刻

块李阳冰篆书碑刻之一，被誉为天下四绝。每年三四月间，乌山东麓的桃花次第绽开，引来蜂飞蝶舞。一时游人如织，争赴桃花盛会。于山上有“榕寿岩”，一株古榕盘根屈干，生长在悬崖绝壁之上，看不到一星土，裸露的条条树根展布于一面悬岩，像一幅苍劲的草书，让人叹为观止。山上的威公祠是后人为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而建的。戚继光班师回浙江时，福州官绅在于山为他设宴饯行。酒酣戚继光带醉步月，仰卧在一块巨石上，后人因名之“醉石”，并于石前建一座醉石亭，从而在他刀光剑影的生涯中，平添了极具浪漫色彩的一章。于山还是辛亥革命福州起义时革命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周围的山坡上和树林

里，相传是起义军的作战阵地。而今炮垒犹在。每当晚风入谷，吹得松涛阵阵作响，仿佛隆隆的炮声，令人想见当年激战的情景。屏山以山形似屏风而得名。它矗立于城市的北面，由于城市建设和道路的拓展，屏山的一部分已融入城区之中，山的意味因此减少了许多。但屏山却是福州城市的发源地。史载，汉代闽越王曾在山麓建王城，所以屏山又称越王山。屏山与乌山、于山相望，形成三山鼎峙的独特景观，这也是福州古称“三山”的由来。

“三山藏”则指的是屏山支脉冶山、于山支脉罗山和乌山支脉闽山。其中闽山最为有趣，说是山，其实就是一块高、广丈余的大石头。这或

许是全国最小的山了，玲珑、圆润，模样委实可爱。石下，还凝着一汪碧水；石上有一句题刻：“半潭秋水一房山”，十分逼真地勾勒出山水优美的情态。

至于看不见的三山：芝山、钟山和灵山，早已与街坊闾巷融为一体，所谓“隐隐磅礴于阡陌者”。虽看不见山形，仍能感觉它们是山，也只有爱山的福州人才有这样独特而美好的情愫。

再说水。福州不仅有享誉中外的温泉汤井，有穿城而过的秀丽的闽江，而且还有众多的内河。河道潏洄，与大江潮汐相通，构成了河网穿梭的水城景象。这些城区河道几乎都是唐宋以来旧城壕的遗址。随着福州城池由北向南逐步拓展，每座古城都留下一道护城河和一些桥梁。这些河道经历代疏浚改造，形成了一个洄流有法的供排水体系，旧时不但有水上运输之便，还可利用江潮冲刷污秽。河



安泰河

道两旁种有许多榕树和柳树，绿荫如盖。在古代文人的笔下，水城的福州是那样富有情调：“人烟绣错，舟揖云连，两岸酒市歌楼，笙歌从柳荫榕叶中出。”内河两岸，同时也是居民聚集区，里巷相连。光听听这些里巷的名字：水流湾、卧湖桥、桂枝里、通潮巷……便如诗般美丽，让人徜徉不尽。





福州西湖

除了内河交错的河网，福州还有一座曾被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赞为“约略西施未嫁”的西湖。西湖的好处在于湖光山色相映。西北群山尽皆倒影在湖面上，与拂水垂柳、卧波虹桥交织成一幅山水相亲的美丽画卷。西湖不大，但经营得法，山石楼台皆掩映在绿树丛中，花木绰约，曲径幽深，将一幅江南园林的绝美画卷挥洒得淋漓

尽致。

而驰名天下的温泉更是福州人的骄傲。那从地底喷涌而出的热流，永远蒸腾着生活的美趣，让福州人发出这样由衷的感慨：“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随着城市的扩展，金鸡山、金牛山、烟台山、乌龙江……更多的山、更多的水进入城市的版图。木栈道纵横交错，串联起一个个公园、绿地，让城市的慢生活在满目青山和盈盈绿水之间悠然前行。

这些山，这些水，便是福州永远鲜活的风光。如果说山是城市的肺，那么水便是城市的血管，因了它们的呼吸吐纳，净化了城市的空气，增添了城市的活力。

难怪，到过福州的人都说：福州是块福地。

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每天被美丽的山水濡染，自然是一种福气。



浅呼深吸之间的“栈道表情”

景 艳

走过许多城市，城市中的栈道是喜欢的去处。那是繁忙的工作之余，零星间隙深化对一座城市了解的途径。然而。有趣的是，在福州生活了几十年，除了门前白马河边那段生活必经的、有限的木栈道之外，我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曾走过其他的栈道。“忙！”几乎是条件反射性的托词让我一次又一次与喜欢的栈道擦肩而过。心底里，栈道终究不过是一段被动的物事，是闲散之时才能随兴而至的去处……直到接下一篇文稿之约。然而没有想到，也正是在这次行走当中，我读出了榕城栈道的不同表情。那是可以互动与对话的表情，在浅呼深吸中展开，在疾跑慢行中生动。

表情之一：很“生活”

生活在白马河畔已经十多年了，却想不起白马河栈道究竟修建于什么时候，也分不清这纵横的阡陌，哪段算路哪段算栈道。只是哪一天走着走着，发现前面多了一条更方便、更整洁的木栈道，通向了芳华通向了芍园，或连接起了乌山路和黎明城。内心里，与其说它是一处景观，莫若是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平时买菜经过的通道，散步时必走的弧形；遛狗时，小狗们呼朋唤友的地方；钓鱼时，钓客们一字排开的阵地；晨昏时，票友相聚表演逗唱的舞台……大家都已经



白马河木栈道

习惯这融贯大街小巷的栈道，习惯了这浸泡着老福州最文艺范的地方。

回过头来想想，很多改变都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记得刚搬来的时候，芳华越剧团附近只有一家餐馆，在河边露天处摆着些椅子，风景也算别致，却极少有客人，怕的是白马河里的蚊子和白马河水的味道。然而，当内河整治伴随着木栈道的修建之后，这里已然是闻名遐尔的酒吧一条街了。夏天的晚上，当沿河栈道旁的灯笼亮起来，各家时尚小店的门前便密密地坐上了人，不算贵的小吃烧烤成了聚会聊天最助兴的宵夜。栈道的入口处，常常是出租车最乐意停留的地方，不过，也往往是查酒驾的警车时常光临的地方。

栈道的修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生活中的人们。栈道刚建好，上面时常有新鲜的狗屎大喇喇地这边一坨那边一撮，是晨起遛的狗留

下的。白马河公园管理处的同志告诉我，这四通八达的栈道其实也是白马河公园的一部分，卫生都是包干的，哪位辖区发现一处狗屎，承包的清洁工人便要被罚50元。“难道遛狗人不会自己把它收拾干净吗？”“哪有？这么多年下来，我只见过一位自己收拾的。”管理处的同志很无奈。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栈道上影响视觉的秽物越来越少了，不单是清洁工大叔的功劳，尽责的“铲屎官”越来越多。生活，赏心悦目多了。

白马河栈道，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条栈道，却至今没有完整地走上一遍，我不知道它的终点，只希望它永远延伸……

表情之二：很“自在”

金鸡山栈道的美名在耳边已经响了好多年。



“勺园1号”文化创意一条街

“去体验一下快城市中的慢生活吧”，“去过的人都说好”。栈道，作为“城市慢生活”的典型物象之一，没有一颗慢下来的心如何能体悟其中之“慢”，其中之“乐”？拖延了许久，终于在一个略微不太热的周日午后，去了一趟金鸡山。

午后，栈道上的人并不多，但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想法。有疾步快走的健身者，有携家带口悠然而行的观光者，也有亲密恩爱的情侣恋人，还有嬉笑玩耍的孩子，也不乏步履沉重的独行者……这栈道，就像一位大隐于世的长者，敞开大门接纳着每一位到访的客人，或斟茶相待，或抚琴相和，或虚位回避……每一位到访者都可以在其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让情

感在这里得到最自由的纾解。不收门票，开放到晚间9点半——除了宠物，这里容得下各种绽放的表情。

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趴在妈妈的肩头，朝着后面的我嫣然巧笑。不知道为什么，那不含一丝杂质的快乐让我急躁的心渐渐安宁。顺着他稚嫩的手指方向，有栈道木板间探出头来的草儿，有枝叶间翩跹飞舞的蝴蝶，我看到了无数被放大的有趣。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美景，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声音，这是一种多么开心的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赤脚而行的冲动。环顾左右，同道者不止一二。

栈道与公园是相辅相成的，行走于栈道之



夕阳下的金鸡山栈道

上的人们随时可以拐进旁边的山道，步入公园的主体，或参观或冷餐或攀爬，改变自己的行走方式或运动方向。半山顶处，有一块足按碎石地，或尖或缓，平时不曾锻炼的人赤脚走在上面是艰难的，雀跃而试的人很多。大人、小孩，拢在一处，走得摇摇摆摆，玩得不亦乐乎。一位妈妈不失时机地教育女儿：“妈妈好疼，你要乖，不然妈妈会更难过。”一阵凉爽的风吹过，空气里满是笑意。那些原本冰凉的小石子在与人类的互动中有了温度，生趣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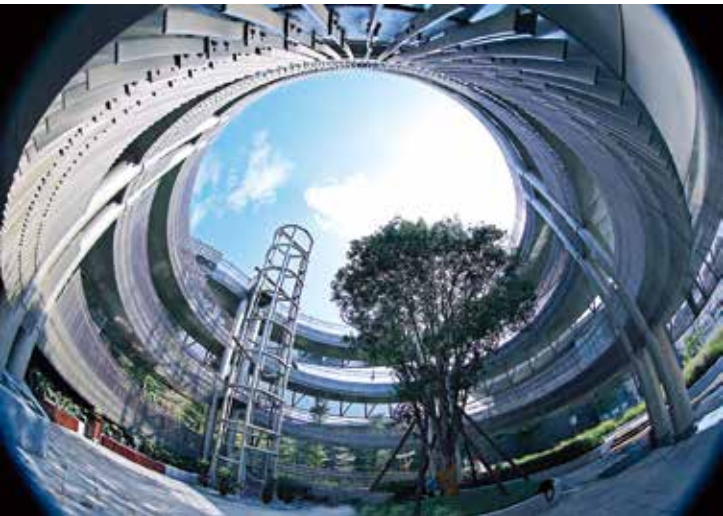
这一福州市首条架空栈道，最大的特点便是“环山看城”。2500米长的等高栈道，标高为80~90米，一根根柱子撑立在半空之中，与远处高铁横跨的高架电缆交织呼应，自有一种雄伟壮观的气势。“山在城中，城在山里”。人在景中，人亦为景。据说待三期森林体验栈道建成，全线将在林中穿行，连通登云水库，直通鼓岭。到那

时，福州的城市会不会更加豁然开朗？憧憬着，一定不辜负这栈道的美意。

表情之三：很“环保”

没有到金牛山福道之前，总以为栈道都是木质的，没有想到栈道也可以用钢来造。最新建造的福道相较于之前栈道的设计多了更多时尚的元素，有了更大胆的突破。走入环状旋梯式的入口，就开始感受印象中坚硬生冷的钢铁的另一面。整齐大气的钢架、钢梁、钢护栏与丝缕相扣、弹性十足的镂空钢丝网步道浑然一体，软硬相衔，柔韧相济，不光让人眼前一亮，也让人心一中一荡。

这是许多福州市民眼中“最靓丽的步道”。悬空步道沿山体而修，在树冠上穿行，远眺城区风景，近看足下树木花草，呼吸着雨后湿润而清



金牛山栈道

爽的空气，有种步步皆是景，丝丝皆入画的感觉。

福道办的小刘告诉我，福道所有的设计都突显了生态的要求：“桥墩式的悬空镂空步道设计，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地面植被的破坏，阳光可穿射、雨水可下渗，既防止了道面积水，也便于步道下方的植被采光、汲水，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钢的回收利用率高达90%，对环境的污染少，也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最好的设计，是对原有自然景观的充分利用。”新加坡设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敬畏自然”是他们最重要的设计初衷。在福道上漫步，处处可见橄榄、龙眼、相思树、香樟树、毛竹等原生态的树木，有的已是几十年的树龄。据了解，福道的绿化，基本立足于对原生态树林进行点缀和整理，很少从外引进大树。栈道两旁的树梢上，悬挂了许多用树枝和秸秆创意制作的鸟巢，有些已有小鸟入住。公园指挥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鸟巢的安装，除了有给鸟类提供居所的功能，还提醒着游客特别是孩子的生态保护意识。

福道的设计还特别彰显了人文关怀。“之”字形、每16米升高1米的坡度设计，让残障人士的轮椅可以轻便通行，行走其上的老人不容易感觉疲劳。后期的管理还会进一步增强智能化。在福道主要出入口和景观节点，都将设置触摸屏和LED显示屏，提供景区介绍、便民服务查询、PM2.5数值、实时温度湿度等信息。在休息平台、游客服务设施等节点，还将提供WiFi用户上网功能，届时游客可通过福道公众号、APP等途

径对福道的服务管理等进行点评。所有出入口也将安装视频监控，实现日常监控及人流量智能分析统计。同时，信息化系统还将融合一键求助、应急广播、森林火灾监控等其他系统功能。

在福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民的意见被广泛地征集，参与度大大地加强了。比如，座椅面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更加人性化？能不能增加观景台、瞭望台？能否延长福道的开放时间？钢结构的栈道如何防雷？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去的时候，工人们正在更换着看起来还新的零部件，为的是“新的设计更舒适安全”。

算起来，今天的福州已经有了许多知名的栈道，除了前面所说的，还有鼓岭栈道、西湖左海栈道、森林公园木栈道、农林大学栈道、晋安河栈道等等，我相信，下一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栈道。说到栈道的表情，每一个栈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丰富的表情难以一一道来。然而，细细品来，忽然发现，那些独特的背后暗藏的原本是一类相同的表情。如今的栈道正越来越淡化装点城市的角色，而逐渐增强了对平常百姓生活的介入感、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调剂感。栈道的修建与完善，一方面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品质追求、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城市居民素质修养、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提升。有人说，栈道是城市浮华之下的“入世桃园”，我却说，栈道是连接城市与人心的桥梁。读懂了栈道的表情，便理解了一座城市的温情。

尽兴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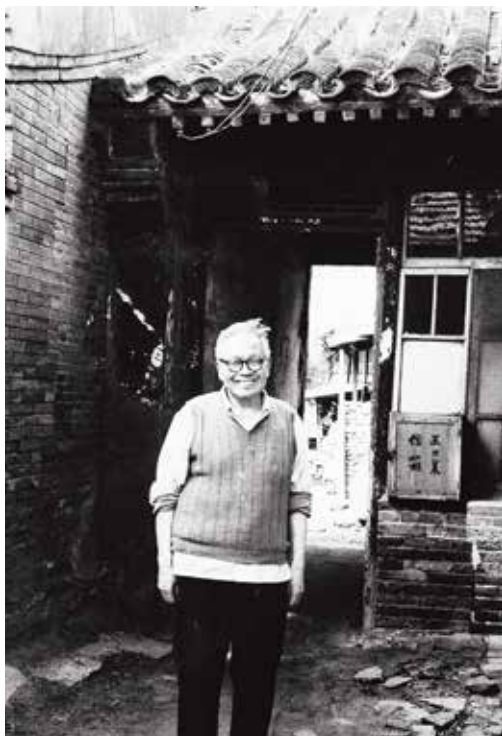
——玩物大家王世襄

陈美者

故事要从北京的芳嘉园胡同开始。四合院里，文弱的母亲仰着头，目光追随着手执长竿在房顶上跑着的少年王世襄。他在放鸽子，屋瓦已被成垄地掀翻。当他一步跨出，从正房顶跳到厢房顶时，母亲直接晕了过去。

养鸽放飞不过是其生活的一小部分。其父王继曾，福州人，民国时期一名人，外交官，早年留学法国；母亲学习西洋美术，擅画鱼藻。舅父中有一位画家、两位竹刻家，若再往上，高祖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始祖王旭窗经营瓷业，发源于江西吉水县清江乡，因之系以西清王氏。明正德嘉靖间落籍福州。西清王氏乃福州名门世家，王家祖居至今尚存，坐落在福州的津泰路灯笼巷7号、8号。如此书香门第，加上家人宠溺，小学至高中，王世襄被送至全英文授课的北京美国学校，家中还聘请了国学耆宿，可这都拴不住王世襄，他哪里肯安坐，一门心思各种玩，种葫芦、架鹰、遛狗、猎獾……自

幼起，“凡是对身体无害的，爱怎么玩怎么玩”。到了燕京大学的课堂上，老师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蝓蝓忽然响起，连同蝓蝓一



王世襄先生在芳嘉园后院门前

起，被老师逐出。先生老来慨叹，“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倒也不算自谦。

一场变故，竟将这终日嬉游画上句号。慈母病逝，不再有关切的目光盯着他顽皮的身影，王世襄于悲痛中一下惊醒，鹰、鸽子皆送了人，狗只用来看家。从此一头扎进学问里。其决绝和透彻，大概也让昔日厮混的伙伴们唏嘘不已。王世襄的特点是，从玩到做研究，均是用功到极致。

他的硕士论文为《中国画论研究》，二十来岁年纪，玩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这样一个大题，王世襄至1943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两年后完稿，共约70万言，用毛笔抄写，线装成帙，出版则是等到60年后了。彼时先生已老，一目失明，自知无力修改画论，抱憾不已。纵观他的一生，前大半生是数十年的沉寂积累，绽放和荣誉则大多是他70岁后的事。

先是毕业后南下谋职。拒绝了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助教等职位后，王世襄由梁思成引着，来到傅斯年面前。傅斯年应该算是民国时期最有个性的学者，他略去客套，问道：“你是哪里毕业的？”回说燕京大学。“傅大炮”不客气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甬想进了，幸运的是，一旁尴尬的梁思成，倒选中了王世襄。虽然在营造学社待

的时间不长，但梁思成的敬业和专业，想来影响了王世襄。日后王世襄严谨的学术态度、格物致知的精神，多少与之有关。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开始投入“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工作。据资料记载，他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收购郭觐斋所藏瓷器422件，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1085件（附件39件）



明崇禎冲天耳金片三足炉，王世襄先生旧藏

等。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这些遭受流离、又有幸经由他手，回到故宫博物院安静存放着的宝贝，展示着王世襄苦心奔波的最终结果，而其中过程，艰险、转折、传奇，无法述说。张建智著《王世襄传》中，或可窥见一些。说是一日，王世襄接到

情报后赶到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秘书在打字。王世襄机警地厚脸皮凑过去，居然是一份青铜器目录。他心下暗喜，循着这个目录辗转警察局、外国军方等各处，终于追查到杨宁史本人。之后又是种种交涉，各方利益拉扯下，愣是将宝物从外人手中抽回，辛苦自不待言。老先生后来回忆时，将这段斗智斗勇、为国追宝的经历，视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还有一件，则是写出《髹饰录解说》。那时，时间已经到了1954年。白天他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供职，汇编《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等，晚上休息时间则投入于此。《髹饰录》此书，或许只

有业内人才知其地位，大概等于中国古代的“漆经”，只有孤本藏在日本。王世襄拿到的是朱启铃老人的抄录本，如此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王世襄倾注了大量心血：一边查阅古今乃至国外文献，一边逛古董店、挂货铺、鬼市（也叫晓市，黎明前交易的旧货集市），观察漆器实物，尤其重视从残件中看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一边拜访京城髹漆匠师，弄清具体技法和名词术语。如此这般，前后持续了9年，《髹饰录解说》写好后，迫于时局却无法出版，王世襄冒着很大风险，油印了200部。不负其燃膏继晷的付出，连海外学者都关注到此著。

真正让王世襄声名鹊起，奠定其在中国文博界乃至文化界地位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成就。从1949年开始，王世襄就对家具产生了兴趣。他的经典形象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装有一个大货架子，架子上备有大小包袱、粗线绳、麻包片等，也不顾寒暑，在北京城乃至郊区、外地四处穿梭，从藏家到一般住户，从古玩铺、鲁班馆木器店到旧木料摊，遇到买得起的家具，他便买下，买不起的，也要苦苦央着人家让他拍照或画图。有时寻到大件，雇来三辆车装好后，才发现车上根本没他容身之所，他也乐滋滋徒步跟在后面推车回来。更多时候舍不得运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家具，佝着背、缩着腿、咬着牙，愣是将东西坚持驮回家来。实在是和人们想象中的收藏家完全不同。王世襄也说自己不是收藏家，他的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迫于



竹刻漆笔筒，王世襄先生旧藏

财力，他买的很多都是残件，就寻去老工匠那，怎么修，怎么做，一边问，一边记，都是书上根本得不到的知识，以至于后来，“家具摆在那，离我二三十米，我就知道是黄花梨还是紫檀，大致不会错。”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大型图录出版。其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等很快推出。然而这只是王世襄40年积累的部分呈现，1989年夏《明式家具研究》在港、台同时推出，很快又出了英文版。这部“在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成功地以理论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将明式家具全面系统地展示于世”的划时代经典，被尊为明式家具的“圣经”，引发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明清家具收藏与研究热潮。

当然，热潮之下，永远有一双经济之手，一般人更多的是觊觎这些古物的价值连城。1998年，王世襄为给自己的藏品寻一理想去处，将79

件明式家具，以市价的十分之一，大约200万元（以便够自己在北京买套公寓，王家的芳嘉园大宅子早就成了大杂院），卖给好友庄贵仑。庄先生也没有食言，按照约定好的，将其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这些家具的最终归宿是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好事者替他心疼不已，特别是王世襄膝下还有三个儿子。老先生只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闻者羞赧。

王世襄的晚年照片中，均是乐呵呵的老人家模样，笑得灿烂、气度温和。外人不知的是，先生生于1914年，裹挟在那个年代的时局中，几乎尝尽各种真味。1948年，他曾被派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当时他在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等方面的独到才



上海博物馆藏王世襄先生旧藏家具

识，已经给外国学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的几所大学、美术馆想留下先生，均遭拒。王世襄继续随身携带一张元代琴师朱致元制七弦琴，在美国各地考察，一心想着归国后将故宫博物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博物馆。一年多后回来。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了“十年动乱”，他自嘲为“一个老运动员”，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红卫兵来“抄家”。此举看似羊入虎口，却是绝处逢生。当时请来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国家文物局同事，识宝、惜物，将他的藏品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十年动乱”之后大部分心爱之物回到他手中）。无奈，命运旋涡一个接一个。1969年，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至咸宁干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乡野的繁重劳作中，拘留时落下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他迅速成长为一个放牛、养鸭、种猪、插秧等各方面的行家里手，还利用业余时间采蘑菇、挖兰花、学打渔……4年后，他拎着兰花，回到了北京的家。再吟起当年自己写的诗句，“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个中滋味，怕只有他自知。

收藏家、文物专家、学者……随着王世襄在家具研究方面的成果问世，人们渐渐认识到先生的学问。更令人惊叹的，是王世襄在民间游艺方面的精深研究。这位能用文言文写重要学术著作、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学者，爱好是养鹰、斗蚰蚩、放鸽子、种葫芦……他把这些游艺做成了学问，编写整理了《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

《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冬虫篇》《大鹰篇》等，人称“京城第一玩家”。据说张中行曾经拜访过王世襄，两人聊到蚰蚩罐，王世襄摸出几个来给他看，又送了他一本《蟋蟀谱集成》，张中行辞了老先生出来，一路走一路吁叹，“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王世襄自述时却是云淡风轻，“不过是早年玩物丧志，往事历历在目，无需搜集资料，即可奋笔直书。”先生一生绝学，后汇成了“奇书”《锦灰堆》4卷。

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的衣着特别简单，尤其夏天，一件大圆领子的老头衫，一条宽大短裤，一双松紧口鞋，手里拿着大蒲扇，一副随处可见的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这个“老大爷”还有一乐子，喜欢美食，常常拎着菜篮一早奔菜市场去，哪里买香菜、哪里买豌豆、哪里买菜瓜，都有固定的摊点，只吃那个地方种的。他的拿手好菜还不少，传说曾在黄永玉组的局中，以一道“海米焖大葱”压了其他人的鲍鱼海参什么的。师母倒是给抖了底：“昨天为了买葱，走遍了一条街。这么一小盘子，用了一捆葱。剥下来的菜叶子就有一筐。”到底还是个“文化贵族”。

2009年，王世襄逝世。他数十年“黎明即兴、深晷始寝”而成的学术著作仍在被研读，他骑着破自行车一点一滴收集而来的明式家具还在博物馆珍藏，他的奇人奇书继续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旧时风雅，毕竟还是离我们远去了。

清末名宦王仁堪 与两位文学大师的祖父

金建陵

鲁迅和金庸，都是中国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两人祖籍都是浙江，并且他们的祖父都牵涉清光绪年间的两桩案件，又都和曾任镇江知府的王仁堪有密切的联系。

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一甲一名进士，曾出任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副官，慧眼识人，门下出过徐世昌、梁启超这样出色的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王仁堪出任镇江知府，下车伊始便遇上了震惊中外的“丹阳教案”。这一年，有不少市民发现法国传教士在丹阳开办的育婴堂院内的桑树林中“置毙孩尸体无数”，“即走告市民，市民立哗噪”。4月25日，天主堂附近居民 10 多人，要求进天主堂察看，遭到拒绝后从天主堂后面进去，发现地上泥土松软，脚踏一陷，见一具木匣，内装有小孩尸体。继而又发现 70 余具尸骨。民众见此惨状，怒不可遏，大声呼喊要攻打天主堂。消息传开，周围群

众一齐涌来，包围了天主堂。丹阳城守备调兵镇压，群众被迫抗击，打伤营兵数名。城守见众寡不敌，只好听任百姓攻打教堂。群众将天主堂及附近住房付之一炬，烧毁房屋 20 多间。

翌日，王仁堪即从镇江赶到丹阳处理此事。丹阳籍的南社成员张素撰写的《辛卯教案始末纪》中曾有如是记载：

太守闽侯王可庄仁堪自郡来，侯迎白其故，导至天主教堂，按视所谓毙孩尸体者，则纵横交错于地，或矐其目，或断其四肢，至惨酷无人理。各相对流涕，守曰：“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嗟叹者久之。因与侯约，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

文中的“侯”便是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查文清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调任丹阳知县。他和王仁堪当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江苏督抚刘坤一要求镇江知府和丹阳知县严查这起重大涉外事端的当事人；另一方面，法国传教士也借口提

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验孩尸后，明确地向刘坤一表明自己的态度：“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于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贖彼族。”（《江苏省通志稿·人物志·名宦六》）刘坤一则斥责王仁堪“迂”，查文清“戇”。在他俩的一再坚持下，最终采取由地方当局赔偿教堂的损失，不追究焚毁教堂者的责任。这样的处理，达到了和平解决外事纠纷、保全了国体、保护了百姓的效果。特别是王仁堪、查文清在这一

事件中表现出的“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的“侠行”，深得丹阳人民的拥护。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由镇江知府奉调苏州知府，不承想刚到苏州又遇上了一桩科场行贿案。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 59 岁，清廷为钦献明岁慈禧太后的 60 整寿，于是年秋天开恩科乡试。

担任这一年浙江乡试的正主考是殷如璋。他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年（同一年科取中的进士）。清朝官场很看重同年关系，由此结成关系网。亲友家中当年要去应试的秀才，均托周福清向殷如璋行贿。于是，周福清就备了一张 1 万两



丹阳发现光绪十一年（1885）的《育婴堂碑记》

银子的期票，让听差到苏州去拦截殷如璋的官船。

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乘船过境苏州，王仁堪照例登船谒见。谈话间，有人送来一封密件给殷如璋。按照清朝的法令，典试官在途不得与亲友通信。为了避嫌，殷如璋便将此密函递给王仁堪打开……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中有一份御史褚成博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即 1893 年 10 月 11 日）报告了此案的案情：

窃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江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

案发在苏州，却是转到浙江省来处理的。

很快，清廷便连续发了两道上谕，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这一年，鲁迅年仅 13 岁，家中顷刻天坍地陷，族人连夜分散各地。鲁迅兄弟不得不走避于城外皇甫庄外婆家中，过早地感受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会审周福清于是年十一月初进行，光绪皇帝也一反惯例，将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改为“斩监候”，周福清因此系狱 7 年。不过，王仁堪并未能看到这件案子审结，此时他已经去世了半个月。王仁堪素有疝气。到苏州的 3 个月中，因接管新任，事务繁忙，疝气大作。十月十八日，赴宴回衙署后突然腹痛，医生误以为

寒疾，药用麝香又过多，服后竟然汗下如雨，至二十日歿，年仅 45 岁。

王仁堪所见证的鲁迅和金庸的祖父牵涉到的两桩案件，对两位文学大师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行贿舞弊而罹祸，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鲁迅有生之年从不提起。但周家的破落恰恰又造就了鲁迅，就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云：“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担任丹阳县令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以官殉”的“侠行”却深受丹阳人民的爱戴。1923 年，查文清病逝于海宁。丹阳百姓还在丹阳的公园内为这位离开丹阳 30 余年的“父母官”召开了追悼大会，并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各自的哀思。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也曾云：祖父“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1926 年编纂的《丹阳县续志·卷十二·名宦》中，还有查文清离开丹阳后“国立‘去思碑’颂其德”的记载。对于和查文清一起“为民请命”的王仁堪，镇江士民在他死后便请求朝廷表彰，皇帝特许宣付史馆为他立传。本来，光绪初年曾有规定，官吏死后 30 年才可以请祀名宦，王仁堪率先破了这个例！

王世真：握紧命运的缰绳

郝俊



王世真

出于对放射性的恐惧，至今仍会有不少人“谈核色变”。而科学家们，则从未停止利用原子核造福人类的脚步。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世真，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相反，它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

作为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学家之一，王世真用半个多世纪的心血，让核医学在我国落地生根。在核医学领域，身为开拓者、奠基人、“掌舵手”的王世真声名显赫。然而鲜

有人知道，这背后是他握紧自己命运的缰绳，书写下的人生传奇。

2016年5月27日，王世真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名门望族生

行走在成都、昆明、太原等地的街头，人们也许会在不经意间与一条名为“庆云街”的马路相遇，匆匆而过。停下脚步，翻开历史的黄页，人们才能得以知晓这些街道的来历——它们以清朝两广总督王庆云的名字命名。

这位清朝道光九年（1829）的进士王庆云，正是王世真的高祖。1916年，王世真出生在福建福州被称为“西清王氏”的显赫家族，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1877）的状元；父亲王孝缙早年留学日本，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远东医学大会，也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母亲林剑言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

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王世真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传统思想很早便在他脑中烙下印记。“我将来要念博士，假如有状元，一定要奔着状元去奋斗。”受家风影响，王世真自幼刻苦读书，心想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作为家里的长子，王世真向来被宠爱，也一直是教书先生和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但在8岁那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极为“叛逆”的事情。

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一点冤枉，这个8岁的小男孩一气之下拿了5块大洋，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去寻找远在南京行医的父亲。任性的王世真急坏了父母。行至福建马尾，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时，家里托亲戚劝他回家，他却执意不肯，全然不顾前路艰险。

“我想做的事情非干到底。我觉得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看你坚持不坚持。”小小年纪，王世真竟有这样的主见。得知王世真的想法，母亲也不再阻拦，亲自把他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8岁的王世真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这次成功的出走，也的确为他此后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抉择写下了伏笔和注脚。

命运辗转路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仅仅一年后，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

原来，清华大学于1932年新建的化学馆名

师荟萃，吸引了他和诸多同学的目光，于是大家一起决定考试转学。有名师言传身教，他们的学术风骨给年轻的王世真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1937年大学毕业后，战火硝烟瞬间击碎了王世真继续在清华园安心读书的梦想。

“‘清华沦陷’是1937年7月28日。”王世真清晰地记住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一次，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从清华园火车站上车，王世真和同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被战火逼至内地后，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教授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战场卫生条件差，军队受到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严峻威胁。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由此，王世真成为在我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战争中的经历，让王世真深切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1945年抗战尚未结束，耳边仍是日本飞机的隆隆轰炸声。他报名参加了当时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发榜时，王世真却看到自己名落孙山。

“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这次制药化学专业招考的留学生，要到药厂实习，且必须是制药专业出身。”化学系毕业的王世真，就这样被挡在门外。

战乱中，王世真一家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对他而言，出国留学必须争取到公费。危难时刻，他又一次决定要将命运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径直前往英国大使馆求助。

不曾料想，在大使馆接待王世真的，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彼时，李约瑟正奉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在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

“李约瑟非常生气，马上打电话找到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问明情况。”王世真回忆，李约瑟放下电话，立马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机上迅速打出一封介绍信。

拿着介绍信，王世真一路跑到教育部。杭立武当即决定，只要王世真联系好学校拿到奖学金，就算是公派留学。

1946年，王世真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衣阿华大学化学系。在美国的生活却是异常艰辛。奖学金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王世真一边求学一边替教授做实验，赚取微薄的额外收入。最困难的时候，他向学校借钱维持生计。

三年后，王世真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而临毕业时，他拿到手的却只是一张精心修饰的博士证书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字条。

“里面说，请你还清欠款以后再领取证书。”回想那段往事，王世真淡然一笑。工作后，王世真获得极高的待遇报酬，只用一两个月时间，就还清欠款换回了证书。

无怨无悔梦

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曾以优厚的待遇向王世真抛出橄榄枝。当时，一心想当制药专家的王世真，也想利用那里先进的设备研制新药，但对方的一个附加条件，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要进入那里工作，我必须先加入美国籍。”王世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他改去刚刚成立的美国衣阿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

正是这次工作的变动，改变了王世真的科研命运，让他与奉献毕生心血的核医学结缘。

在那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十四甲状腺素和碳十四门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也为他此后致力于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身在国外，会非常容易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尽管在美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内心希望祖国能够强大的梦想，强烈感召着王世真早日回国。

1951年，王世真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国

内，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当时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而正是回国后不久的那段时间，他完成了一项足以堪称伟大的工作——首次在中国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特”。

此前，被民间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几乎属于不治之症，几百万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特”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疾病不再意味着死亡。

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要说最为艰难的工作，在王世真看来，非创办同位素训练班莫属。

1956年，在王世真眼里是我国核医学研究的春天。当年，在我国拟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全部依靠自己创造。”王世真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

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十年动乱”期间，出身封建家族的王世真自然会被卷入无法逃避的政治运动，成为批斗对象。1968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其间母亲辞世。

多年后，他在一篇题为《无悔归途艰辛 唯愿祖国富强》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干校的‘双抢’，我没能见上高龄老母最后一面，还丢失了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

1987年，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在核医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王世真最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才的成长。到了80多岁的年龄，他还坚持要为研究生开一门课，并在课程开场白里对年轻人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才女诗画聚和路

孟丰敏



刘蕙愔

福州仓山区聚和路因路东端有聚和里而得名。聚和路上有不少老建筑，比如德园、宇园、漆园。但，最令我遐想的是一座已经消失的私家宅院——淇园。这座在福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私宅曾经住着一位美丽高雅的才女。她和福州城内的才女们组成寿香诗社，每月例集一次，临场

拈题，限时限韵，作七绝二首或词一阙，然后轮流评点、吟诵，于古香古色、诗情画意中操琴、绘画，文娱雅乐。这位才女，姓刘名蕙，字蕙愔，号修明，螺洲人氏，工诗、词、画，是晚清至近代的闽都十才女之一，被誉为“闺帷之杰”。

诗香缭绕的淇园

北宋时期朱熹的叔叔朱棣游桃花山后赋诗《郑德予同游福州桃花山》：“江村小筑路斜斜，模写癯仙四壁家。闻道读书忘肉味，不缘避世宿桃花。”

民国时期，何振岱和刘蕙愔称呼桃花山的聚和里为“江村”。昔日江村烟水尽诗情，掩扉听雨、莳花揽月、乐温旧经，才女蕙愔以此为乐，并邀福州才女姐妹们来其宅邸“淇园”中共话诗趣并燃香吟咏。淇园位于仓山区聚和路南端（原聚和路7号），是一座二层西式小楼，一楼有券

廊，二楼墙外春萝垂柳般蒙着墙，阳光照耀时，墙壁莹莹闪着碧光。楼外一座大花园，园亭雅净，楼前几竿翠筱，寒梅一两株，晚菊、海棠几盆，高松一株，兰草幽幽，水仙盈盈月中开，盆山数座，风蝉笛韵，烟岫湿翠横窗，老树蔽墙，窥天一角，独有遐情。

《藤山志》卷之二中有“淇园居”的条目注：“在龙桥北境鳌园。清康熙时王贞侯读书处也。今没。”《藤山志》的作者蔡人奇1872年出生于下渡小岭，志中所说的“淇园居”肯定不是刘蕙愔夫妇于1930年后建的淇园了。刘蕙愔家淇园的美景，晚清著名作家、学者金松岑于1934年在《艺浪》杂志发表诗《淇园赠主人吴承淇》赞曰：“桃李漫山夹远青，笱笱万亩夜筛星；叩门不为春醪熟，爱煞君家醉绿亭。”吴承淇乃蕙愔的丈夫。由诗可知淇园在仓山的桃花山附近，桃花山上自古桃李漫山，景色秀丽，当时商贾贵胄纷纷投资桃花山上的马厂街，建起了许多花园别墅，比如梦园、可园、鼎庐。当时淇园周围没有高大建筑，所以从聚和路远望，可见到风景怡人的桃花山，无边翠田外，深山秀壑一片青黛之色，而淇园里的春色如酒香一般醇厚，散发出醉人的芳香。园子里的亭子似乎也在春景中醉了，这位写出中国文学名著《孽海花》的潇洒文人，迷恋这园里园外的美景，心醉之后，把淇园的瞻绿亭名字也写“醉”了。蕙愔晚年有一首诗提到淇园里的瞻绿亭《雨天瞻绿亭小坐》：“往事忘怀未，新欢且莫论。水边情愈淡，雨外意难温。昼寂蓬门

闭，风高老树喧。秋声将断雁，天际送黄昏。”

由此诗看，亭子应叫作瞻绿亭。蕙愔是淇园的女主人，不可能写错，且这亭子的名字是很讲究的，源于诗词典故。诗经《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绿亭的名字巧妙地融入了吴承淇的名字，表示男主人是个洁身自爱的君子，谈笑有鸿儒。吴承淇确实和当时闻名全国的大师、文豪们都有密切来往，比如严复、陈宝琛、陈衍、何振岱，还有国学大师金松岑也曾受邀来淇园做客。绿竹蓊郁的淇园里，金大师夜晚仰望星空，觉得视野开阔，心情舒畅，却没想到吴承淇夫妇造园如此煞费苦心，不仅宅邸以男主人名字命名“淇园”，或许也是故意嵌入《藤山志》中名人王贞侯的读书处吧，连这瞻绿亭的名字也暗藏了“淇”字。可见吴承淇也是读书人，颇有智慧远见，所以娶了当时名闻螺洲的才女蕙愔为妻，这样才能琴瑟和鸣、和谐恩爱。

但蕙愔写这首诗时，吴家家道中落，淇园景象业已衰败，故而在诗中将豪宅说成是穷人家的蓬门。整首诗用词非常简淡，透露出苍凉的心境，诗情抑郁悲伤，不似她早期住在淇园时写的作品《雨中看梅》：“粉墙遥望处，雨外起红阴。看去方疑早，穿来始觉深。寄谁须驿使，照我有天心。冻雀飞都尽，霜鲸响亦沉。漱收空水定，晕重古苔侵。谱笛春虽好，怀人怨不禁。冷香团

一抱，寒气积平林。拟待和烟写，还期倚月吟。”

蕙悒最喜梅菊，每当寒梅吐蕊，便持杯酒徘徊花下为乐；若逢飘雨，以为趁雨看梅亦是一好题，所以写梅的诗词特别多。《雨中看梅》虽犹有少妇怨气，但用词典雅，描写的景色充满诗情画意，可知她的居住环境优美、生活优裕，又无事可做，方能懒洋洋地弄花倚月。

蕙悒 1895 年出生，6 岁时父母早逝，由兄长刘元栋抚养成人。刘元栋胸怀磊落、风仪修伟、热心助人，被当地人称作“慷慨刘先生”。蕙悒乃民国闽都十才女之一，早期因颇有文学才华，在螺洲乡间传为美谈。虽说她支持兄长革命，希望自己也能报效祖国，然其性情淡泊，不似福州巾帼英雄方君瑛那般果敢刚烈，且此时革命已成功，福建已光复。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7 岁的蕙悒亦在这一年，嫁给同乡的螺洲人吴承淇。吴氏在螺洲是望族，子孙兴旺，能人辈出，吴氏祠堂建得辉煌气派。蕙悒虽然父母双亡，二哥为革命早逝，家庭不幸，但作为乡间的著名才女，且容貌端庄秀丽，吴承淇十分爱护。婚后，吴承淇带着蕙悒来到北京，暂时寄居于严复别墅。在京期间，蕙悒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年幼的儿子吴秉彝不幸夭折。多年后，她作诗《忆亡儿秉彝》。这首思念亡儿的诗，把儿子恍惚回到母亲身边绕膝、写字读书的情景描写得令人心碎。后来她收了一个养子，叫他都儿，对他也十分疼爱。她在都儿去哈尔滨大学读书时，还写信劝导

他：“爱子情之常，爱之道不一。浅爱肥其身，深爱坚其骨。我起为儿说。愿汝勤读书，福自书中出。我之所谓福，非徒指物质，所谓学有成，身为邦之杰。”

这段话可作许多母亲的教子箴言。即使有了都儿，她依然自怜自艾，毕竟从小就失去父母，青年又丧子，遂感到人生无常太痛苦，只好皈依精神解脱。1936 年，日军侵扰北京，时局紧张，在北京住了 20 多年的蕙悒也随丈夫吴承淇回归故里。回到福州的最初一段日子应是蕙悒比较愉快的日子。她拜何振岱为师，和闽都才女姐妹们的聚会使她暂时摆脱了思念亡儿的痛苦，移情到才艺的关注中。当年烟台山作为租界，日军飞机不敢飞来轰炸，可保人身安全。何振岱和才女们曾一度到淇园来避难寄宿。

1950 年后，淇园被改造为公房。55 岁的蕙悒只好迁往别处居住。60 大寿前夕，她安居在鼓山的千佛庵里，此时她的心境倒也比较平和，说她自己：“60 岁了，自寿忘自悲，置我千佛中，导我万缘空。”而且此时她贫病交加，冬天了还要靠做松香盒子来维持生计。想起当年的富贵生活，她不由感叹说：“昔日红炉闲拨火，何如冻指贴松香？”

父女般的师生情

1914 年，闽派诗的首领人物、“同光体”诗派创始人陈衍到北京，寓居在陈宝琛住所。陈宝

琛是溥仪的老师，是吴氏夫妇的螺洲同乡。吴承淇为娶了一个才女为妻引以为豪，便替好学上进的爱妻向陈宝琛拜师。陈宝琛却介绍蕙愔向陈衍学诗。因为陈衍年纪大了，在北京时间短，对蕙愔只能针对习作进行点拨而已。蕙愔很珍惜向陈宝琛、严复、陈衍学习的机会，常常拿自己的习作请他们点评和指导。当时，她以严复别墅为蓝本所作的别墅画，在北京书画界广为流传。

蕙愔在北京期间，与林徽因也有交集。林徽因的名字原是林徽愔。那时的福州文人给女儿起名，喜欢用“愔”。十才女里就有刘蕙愔、王德愔两位。愔的意思是安静和悦。蕙愔比林徽因年长9岁。1923年，19岁的林徽因开始在北京文坛初露头角时，28岁的蕙愔已在北京文艺界颇有名气，但因低调而影响关注。而作为螺洲同乡，她们在很多场合会遇见，就免不了要互打招呼。这时可有点麻烦，成人的名字，只能称字，不称名。陈宝琛、陈衍等称呼刘，必定称呼她的字“蕙愔”，而非她的名“蕙”。蕙愔和徽愔读音一样，真是令人有点尴尬。据说后来林徽因为了避嫌而改名为“因”，不知有无此事？

蕙愔虽然拜了不少名士为师，但她真正的老师是何振岱。她何时开始向何振岱学习，没有明确记录，但何振岱1917年时曾写了一封信给蕙愔，这时已称呼蕙愔为“门刘生蕙愔”，说她喜欢诗词是好事，但不要看重虚名，说女子也可以是卫道者，同时感叹自己50岁了学问依然贫乏，但他不怕，说如果学问增加了，自己也老了。这封

信写得情感真挚、言辞恳切，如同对女儿说话，毫无老师的架子。由此可见，他们师生时间很长，至何振岱1952年逝，估算大约35年。

何振岱的文笔、名气究竟如何呢？陈衍和何振岱是近代福建文坛的领军人物。陈衍比何振岱大11岁，也比何振岱在全国更具影响力。1909年，何振岱到上海后认识了陈衍。陈衍为何振岱文采所震惊，逢人扬誉、请何在扇子上题诗。又常在其负责的上海杂志的“文苑”栏目上刊登何振岱的作品，顿使何振岱诗名天下闻。何振岱回福州后，买下大光里16号的大房子与15号的陈衍为邻，称陈衍为三叔。在陈衍的影响下，何振岱成为“同光体”闽派的殿军人物。

1923年，何振岱受老朋友柯鸿年力邀，举家赴北京，在柯家教其子女。何的妻子与陈宝琛的祖母有亲戚关系，在京期间和陈宝琛交谊极笃。陈宝琛十分欣赏何振岱的文采，常请他代笔应付求文的富豪，让何振岱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当时文人极重师承，何振岱名气大，能拜他为师视为荣耀，故执贽门下者众多。这期间，蕙愔便常有向何师学习诗词、国画和七弦古琴。1936年，日军逼近北京，年近70的何振岱“倦鸟返乡”，从此不再离榕。

何振岱回到福州后，带了7位女弟子跟他学习，乃王德愔、何曦（何振岱的独生女）、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八才女中，何振岱通信最多的是蕙愔。蕙愔自幼父母早逝，视何振岱如父，二人情同父女，通信所谈的

话题涉猎范围广。那时蕙愔丈夫为了传宗接代，取妾生子，同住在淇园里。蕙愔有一段时间避开淇园的热闹，独居螺洲别墅，常熏香养懒、静眠，或者念经绣佛来打发无聊时光，似已与世隔绝。何振岱觉得她这样生活太孤寂，会出意外，写信劝她还是回淇园，说这也是她丈夫的意思，并劝导她说：“世事真无尽如人意者，即使抽身自便，而所到之处，亦有违心者。要十分如意，直等修到灵山悟道之时，舍此无非烦恼地……夫远器就静，捐扰耽幽，小榭枕流，明窗列岫，栖神昆仑之巅，调息黄中之宫，养元真，涵太极，洵足乐也。但今非其时耳！且琴书待理，松雪为期。望吾弟度之，如何？如何？幸即惠复。”收到老师关切的信，蕙愔十分欢慰，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感谢老师。

何振岱和蕙愔之间父女般的师生情也与学佛慈善有关。何振岱信佛不杀生，路遇老牛将被屠宰而买下为其养老。蕙愔则因远游将养了三年的家鸡放生到西禅寺去，谁知鸡被放生后，不吃虫而改吃小米了。何振岱听说后，就写信说：“有生无大小，贪生情则同。养生而杀生，残忍实可恫。一虫亦弗啄，孰谓物无聪？愿衡遇生物，施放情毋慵。即自此鸡始，慈心大扩充。”

蕙愔也是何振岱最得意的弟子。蕙愔将倚声、作画、读易、弹琴、学书、习静、礼佛、种花作为常课。何振岱擅操琴，教导蕙愔：“为乐以陶心，起用先调气。若使气累心，焉能神合器？是故操亲人，以和为其至。”还要求她以八课各赋

诗一首给他批改，说：“诗、文、字三事最忌俗，一俗虽千好万好都算不好。何以谓之俗？无灵气耳。灵气是先天带来的，惟慧心人喻之。”何振岱觉得蕙愔的诗词优美，写信鼓励她：“拔可先生来书云，蕙愔女士曾寄一诗，淹博丽密，令人不敢逼视，大江南北名人皆诵之矣，未暇奉和为歉，晤时乞为道候。以上六句皆拔翁书，其称誉蕙愔可谓至矣！”

1952年，何振岱过世，她作诗《哭梅叟师》：“晨昏总在思量中。好梦都随流水去，悲欢离合浑无据。惟有文章一脉真，报恩首事刊遗者。”

蕙愔书画皆佳，才跨诗词界和美术界。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刘蘅诗词《蕙愔阁集》，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诗词集重版两次。蕙愔加入了中国美协，1957年7月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特约撰述员，“十年动乱”后转为馆员。由于师父何振岱是馆里的名誉馆长，蕙愔便把文史馆的工作当自己的家事来做了。

何振岱对佛经研究颇深，甚至可千里之外念经救人。蕙愔曾向何振岱学习佛学，与文史馆同事赵玉林成为挚友后，常与赵玉林交流学佛心得，虽到晚年亦没有得道，却也修得心间禅香丝丝开慧，笔底明珠字字闪光。

1998年8月8日，一代才女刘蕙愔带着对师父何振岱、兄长刘元栋、才女姐妹们的无限怀念之情，逝世于福州，享年103岁。

百岁破布子树希望随想

邱泰斌

新年刚过，据报载，位于福州东街三牧坊口紧挨马路边的那株百岁破布子树抢救有望，开始枯木逢春。我是老福州也是老园林，闻讯，欣喜之余又忧心忡忡，浮想联翩。

破布子名“破”实不破

破布子，又名破布木、树子等，紫草科破布木属植物，多年生落叶小乔木或小灌木，生长分布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台湾、南亚和东南亚等地低海拔地区，可长至3—12米（最高可达四五层楼）。有极多的分枝，幼枝呈现褐色且有软毛，叶子与叶面有树皮呈灰黑色，春末开黄白花，双叉式的卷花序集中在小枝顶端。到了夏季，整棵树上结满果实，熟时由绿转黄橙，热热闹闹。其名不雅，其貌不扬，其果可佳。据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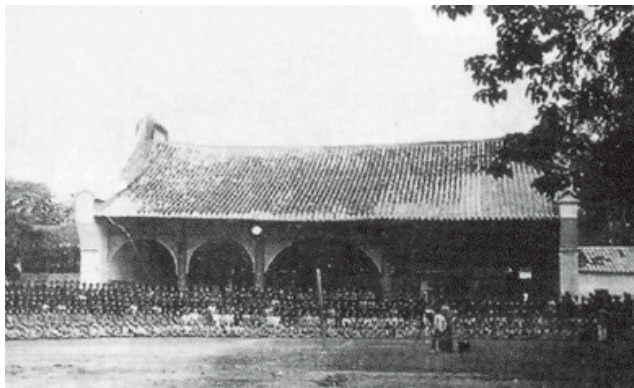
实尚可生食，亦可药用解毒。但我没有吃过用过，也不敢吃用呢。

我特地请教了一位徐姓教授级古树名木专家：破布子因何缘名？被告知，破布子，因叶子可做纸，有布渣，故名；民间又有一种说法：破布子结籽时，小孩取之装入竹筒内，打出的响声谐音如“破布”，又名。在福州，破布子过去曾是乡土树种，数量很多，仅次于榕树，如今已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园林部门曾多次组织城市古树名木普查，眼下百岁以上破布子，在全市总量约60个品种、1500株的古树名木中仅剩几株，它古树、名木双名兼得（犹如双学位），可圈可点。

三牧坊这株破布子，究竟是人工种植，还是鸟儿送种、风儿飞播，抑或是羽化神物？众说纷纭。但公认出现在清末，又选了个好地道好节点。



保存至今的凤池书院与正谊书院牌匾



全闽大学堂旧址

百岁名木百载名校

三牧坊前世今生，老福州们耳熟能详。人猿揖别，石头磨过；白驹过隙，百年倥偬。这里是千年名坊百载名校所在地。最早见载于宋，称明正德年间坊内何姓三兄弟同时仕途发达，故名。清嘉庆二十二年（1816）福州总督汪稼门在坊内创立书院，道光元年（1821）盐法道吴荣光将坊内宋丞相许将“凤地里”故宅划入其间，改“圣功”为“凤池”，从此凤池与鳌峰、正谊、致用并称福州四大书院，而三牧坊居之有二：凤池、正谊。1902年两院合并，成立公立的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1915年改名福建省立第一中学，1951年8月定名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至今，历史悠久，闻名遐迩。

三牧坊老居民自豪地告知，自宋以降，三牧坊为荣耀之地，大雅之堂，人杰地灵，俊彩星驰，显贵名流辈出，莘莘学子荟承，一草一木，一举一动，足以牵动福州人的神经末梢，影响深远。巷小名气大，有人统计过，这里除了史上出过无数达官显贵，还走出过15名两院院士，林觉民等仁人志士，林纾、陈衍等文化人杰。

百年老树百年沧桑

三牧坊口百岁破布子，百多年间多遭天灾人祸劫难。

城市扩大、道路扩建、建筑扩张、管道扩充以及天桥修建、学校修缮，无不伤及。当然，百岁破布木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慈祥老人，一位阅尽人间春色的故事大王，也见证了城市建设、坊校发展。

一个多世纪里，城市建设一逼再逼，破布子木一让再让，从巷口墙角杳见一直被逼着往前靠，往前显，往前挺，一直挺到马路路沿石旁，挺到了人人都想破坏、人人都能破坏到的田地。车水马龙，怯怯难躲，瞬间难安。其中1962年南街改造，连三牧坊坊牌也拆移他处。

心忧古树名木，我特地跑到现场勘察。如今，三牧坊宽不足4米，长不及240米，靠着天桥沟通，一头连接最繁华闹市东街口，一头延至百年老街卫前街，白天熙熙攘攘，夜间安安静静。百岁破布子位于三牧坊天桥旁，地面树高可及四层楼房（已属类中巨人），树根紧靠马路路沿石，地下受困于诸多管道（现在国家提出了“窄马路、密路网”的新理念，请注意，并非“密管网”），前些年遇有天桥施工干扰，周遭环境越来越逼仄，基根越来越显露，去夏又惨遭强对流天气袭扰，断枝扯皮，至今树干中空，靠皮支撑，耸而可亲，高而可危。

我至今记忆犹新，若干年前我还在市园林局办公室主任位上，一次接到举报：道路施工正在用吊车起吊福一中三牧坊口的百年破布子。我火烧火燎联系上当时的福建经济报社记者吴蔚。吴记者的父亲为南下干部，母亲曾任福一中领导，

兄弟姐妹从小都在福一中校园破布子树荫下长大，十分熟悉依恋破布子。但见百龄名木惨遭破坏，犹见百岁老祖母遭劫受损，痛心疾首！当下利用媒体喉舌大声疾呼。幸哉！各方重视配合，保下了那株百岁破布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下一株古树名木更可谓功德无量，心意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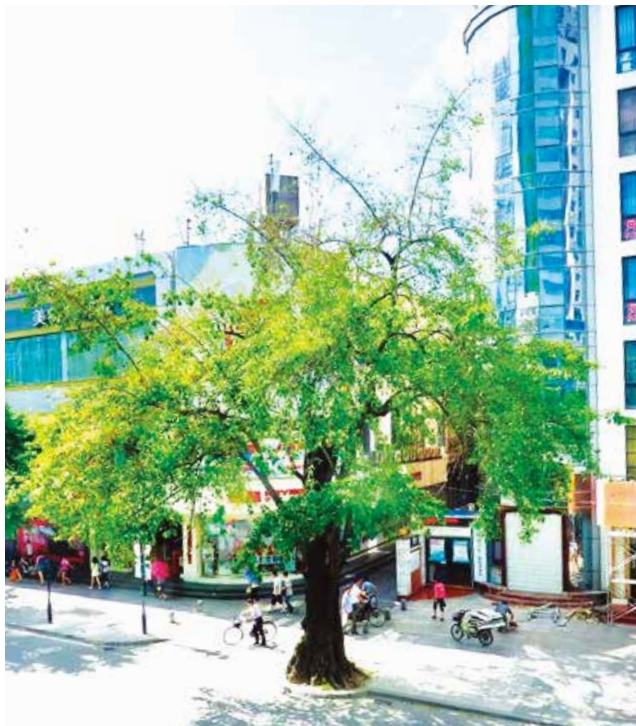
百岁名木希望所在

欲使百岁破布子长治久安、延年益寿，特献锦囊于下：

俗语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似乎树人重于树木。但古树名木保护如何，仍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素质。鲁迅先生于20世纪曾大声呐喊：“救救孩子！”而今我要大声疾呼“救救心灵”、崇尚文明！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市民不断增强知我古树名木、爱我古树名木、护我古树名木意识。尤其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中学时期，人生奠基，上学放学，路过经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烙印深深，影响终身。因此，保护古树名木，要倡导从教育抓起，从学校抓起，从孩子抓起，从提高全民素质上下功夫。人心不古，文物作古；人类不文明，万物将失明。仁爱为上，人心向善，心中燃盏长明灯，万古有仲尼。

规划引领，建管并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文物资源，国字之

宝，时间就是生命，抢救迫在眉睫！城市规划是龙头，是系统工程，应统筹兼顾，分别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布局，将古树名木保护列为重中之重，尽快落实到位；城市建设项目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伤及古树名木等无辜。如城市道路敷设管网，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尤其对路旁古树名木伤害极甚。记得，福州老市长游德馨同志当年到中央党校市长班学习时，曾发表过一篇体会文章，题目似为《城市道路为什么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全国“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等城市补丁难题似乎尚未破解。国家提倡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何时能得以普及推广呢？



三牧坊口百岁破布子树

严于执法，治以重典。城市古树名木保护法律法规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违者有法不依，治者偏宽偏软，致使古树名木一损再损，少之又少。城市古树名木保护执法牵涉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系统性、复杂性、科研性等诸多因素，必须全民动员，综合整治，方能亡羊补牢，保驾护航。重奖之下必有勇夫，重典之下必有怯者。典当重用，法方责众。

活之文物，特殊保护。世人应知，古树名木是唯一以生命形态见证历史的“活的文物”，并且为不可复制的珍贵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文化，就是历史，就是科普，就是乡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树名木的保护价值与珍贵性，与名人故居、历史名园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保护的意義、存在价值无可估量，无可比拟。“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名园易构，古树难求”。一幢楼房一条马路一座天桥的价值，岂能与三牧坊口的百岁破布子相提并论？

2015年7月，三牧坊百岁破布子遭强对流天气损害，园林部门及福州古树景观工程公司及时施救，措施有力，方法得当，效果较佳，堪值点赞！

古树名木属珍稀群体、特殊群体、弱势群体。唯其珍贵，尤需护卫；唯其特性，更要用劲。保护为先，动手为早，防患未然，措施到位。古树名木保护颇具特殊性专业性，其到位的保护，必须做到树体、生长环境以及景观环境“三位一体”。按此标准要求，大家仍需努力！

我的那棵小桑树

乔梅

还有人记得那棵树吗？莫非那树已成了我独自的秘密？也许呢。

那是一棵桑树。她不老，亭亭玉立，树皮有浅浅的裂纹，密密的卵型叶子葱翠欲滴，枝丫上开着黄绿色的小花。她美吧？

恐怕谁也想不到吧——她曾安静地生长在那样一个地方！你到福州东街口看看去，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喧嚣无比。十字路口东北角上，聚春园酒楼、肯德基餐厅，招牌高悬，霓虹灯闪烁，热热闹闹地招揽着客人。边上，一长溜各色小食店五光十色，食客挤挤攘攘……对，她，那棵小桑树，在过去的岁月里，就曾经安安静静地、温温柔柔地立在这儿！

那时节，这儿没有高楼，没有挤挨的小吃店和熙攘的食客，没有川流不息震耳响的汽车阵，只有一座朴实庄重的八一剧场、一座曾作为报警台的高高的鼓楼。剧场和鼓楼之间的空地上，自然生长的小草间，就立着我的那棵桑树！

我是个爱爬树的、馋嘴的丫头。跑到桑树

下，抬头看去，卵型的叶子间，一颗颗一串串粉红的、紫红的桑葚探出头朝我笑呢。我迫不及待地爬上去，站在树杈间，一颗颗摘下来就往嘴里送，甜滋滋的，我笑出了声。遇上不太熟的，酸得我直皱眉眨眼，可也不舍得吐出。

有时，我坐在树杈上，悠悠然地观看着各色路人，就像看一出节奏舒缓的影片，那感觉好极了。有时，抬眼从笔直的杨桥路望去，一眼见到尽头一轮即将落山的太阳。衔山的落日映红了天边的朵朵白云，满天宇散射着玫瑰红的霞光，就连远处的人和树似乎也都披上了淡淡的红色轻纱。啊，那美景是我这个小丫头无法形容的呀！我只有傻呆呆地长久注视着那轮落日。

记得几年前，我所住的小区前的大片楼房被拆除了，眼前猛然空旷了。一天傍晚，我从外回来，一眼见到了没了楼房遮挡的道路尽头那天边一轮通红的夕阳！久违了的美景啊，我的眼泪竟一下子涌满了眼眶。怕路人觉察而对我心生疑惑或者笑话我，我赶紧若无其事地高抬起头睁大眼

晴望天，不让泪水滚下来，可我知道天边的火烧云在热切地诱惑我呼唤我继续去关注它们……

当年，每回从桑树上爬下来时，我都要摘上一把嫩绿的桑叶，回家饲养我的蚕宝宝。那也是我的大乐趣。回到家，急迫地打开大纸盒，撒上几片桑叶，几十只小蚕立即爬到桑叶边上开始啃噬，“沙沙沙”的啃叶子声是那样欢快。每天，我都准时喂它们桑叶，看着它们长大，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哟。每当蜕皮时，它们就抬起头不吃不动。终于有一天它们不再吃桑叶了，高傲地昂起头，吐出雪白的蚕丝。几天后，蚕丝就结成了一个亮亮的茧儿，蚕儿们变成蛹躲在各自的茧里。我总是焦急地等着蛹变成蚕蛾飞出来下卵，好让我再采桑养蚕。

不知什么时候，这棵给了我欢乐和美感的桑树从我眼前消失了，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吗？是我作为知青被发配到山村落户的时候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唉，真不知该向谁、该怎样诉说我失去了那桑树之时的心情。情到深处人自孤独。而物呢、树呢，又当怎样？那棵小树会因被人遗忘而感到落寞孤寂吗？或许，她已成了一种神秘的存在，寄存了我儿时的思念，一颗桑葚就是她对我的一缕关怀，她永存在我的记忆里，向我微笑。

此后，几乎每回经过东街口那地方，我都忍不住往桑树曾站立的原址瞄去，却又不忍细看，旋即移开目光。喧嚣闹腾中，我尤怀念那棵桑树。

现今，城市里到处有经人工修剪造型的植

物——花草灌木乃至树，虽说雅致，却没了自然美的生命，我不喜欢。越是朴实无华就越接近美，就如我的那棵桑树。她不妩媚，但那种朴素，那种真诚，那种平淡之中的温馨哟！

对桑树的怀念，不免又让我想到：如今有多少人在城市里还望见过那轮令人感动的亲切的落日呢？霞光、火烧云，天空瑰丽无比；斜阳、烟柳，寄托人无限情思。没有了！人们失去了从树荫下观赏夕阳的醉心之美，同时也失去了夜晚观赏璀璨星光和萤火虫飞舞的柔和之美。

思绪还回到我的桑树。小树，是一首诗，我难以完美地写出她，但我拥有过她，拥抱过她。简简单单的物象，具有了超以象外的深广的艺术魅力，自然的真实变成了艺术的真实，于我，也是一种艺术心灵：遥远的诗境、画境。意境——意和境，境和意，相融相谐，互为升华。——唉，想多了，不就是一棵树吗？恐怕我是自作多情了吧？

我不能说这是“乡愁”，何况榕城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呢。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有言：“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过去了的未必总成为过去。思恋之中的那一种惆怅啊！惆怅在这里也与艺术沟通了。这惆怅这相思似乎与尘世的岁月不能企及、不能挨近，然而，却有一种摄魂的美感。

为什么会这样？小桑树哟，你能回答我吗？你在哪里？

荷塘盈盈吐芳沁

高 琴

福州台江城区有一处精致优雅的公园，谓之茶亭公园。茶亭公园以荷花著称。公园面积 3.57 公顷，其中水域就占 2 公顷，遍植荷花。

不看古榕奇树，不看月桥假山，不看琼台楼阁，一进园就被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迷住了。一池一池的墨绿叶子朝四面八方铺展开去，重重



陈迎晖 / 摄

叠叠。好喜欢矩圆状的荷叶，那造型像倒扣的雨伞，又像仙子的手掌托着晶莹闪烁的水珠儿。而一朵朵盛开的荷花，雪白的，像观音菩萨的莲花座；粉红的，像天宫瑶池里仙人的灯盏；深紫的，像朝霞一点点落在人间挂在挺立的枝梗上……都是那样的光明透亮，那样的雍容华贵，那样的安静娴雅。还有如清纯少女含苞欲放的花蕾，鲜艳欲滴，含蓄妩媚，叫人恨不得捧在手里低头亲吻；还有稍微疏忽就漏了观赏的莲蓬，与绿盈盈的叶子同色，莲蓬的“灯盏”上有一个一个小孔洞，里头坐着穿翠绿衣裙白生生的嫩莲儿，让我想起了在乡村随意采了几束莲蓬，一路举着一路吃着，清甜可口，满嘴生津，感觉身心无比快乐。不知怎的，却想起了一个哲学命题。听说考古发现，这荷莲种子能够存活上千年。青青的种子竟可以活上千年不腐，世间有什么可比呢？脑海亮光一闪，哦，就是文字！你如青青的莲子，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记下你生命的感悟，这便是历史痕迹。数千年数万年后，也许你的文字仍能像古莲在幽暗中闪烁着光芒。文字竟如莲子一样，这便是佛家所说的“不灭”吧。茶亭的荷花池一塘接一塘连成一片，有阔大的绿叶，有各种颜色大大小小的花朵花蕾，有高高低低擎起的莲蓬，池塘盈盈丰富多彩，吐红摇翠娇艳妩媚，给人许多遐想，许多美的感受。

人们喜爱荷花，它有不少好听的名字，如“睡莲”“藕花”“玉环”等等。据说荷花的出现比人类还早，属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仅栽培史

就有 3000 多年，始终陪伴着世代代的人们。如今主打的颜色有雪白、淡黄、深黄、淡红、深红、淡紫、深紫，还有杂色的。花朵有单瓣的、复瓣的、重瓣的。据查有 200 多个品种。人们爱荷花还在于它浑身皆是宝，对人类无保留奉献。莲子为珍贵食品，藕为餐桌上的佳肴，花瓣、嫩叶还可以生吃或泡茶，莲心、莲房、莲须、莲梗、根茎都可以入药。在农村，人们还常用莲叶包装食物，方便、保鲜。而荷莲的品质更是让人赞不绝口。北宋理学家周敦頔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于形象准确地道出了荷莲的高雅圣洁，被传为千古名句。确实，莲藕的地下茎是过滤器，有效地吸收水中的好氧微生物并分解污染物，恢复水中生物链的结构，促进水域生态系统逐步实现良性循环。画家们在画荷时，往往喜欢摆放几只生动的鱼儿。那荷花总是优雅地挺出水面，接受阳光和雨水的洗礼，犹如心存高远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佛教中，荷花被誉为“我净”境界，漂浮在欲望的污水之上，是超脱红尘的象征物。佛教的发祥地是印度，印度以荷花为国花。我国的澳门行政区也以莲花为区旗和区徽图案，也许是“荷”与“和”、“莲”与“联”为谐音，意味着中华儿女联合在一起，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不由又想起了一位书法界的文友，送我一幅“花开见佛”的书法作品，这四个字的意义应该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要如莲花般保持身心的纯洁高雅，向善向上，香气自然清远。

中国人崇尚荷花的美丽和品德，历代文人们歌颂荷莲的诗词很多。比如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泛清波”，描绘出一个个清新意境，耐人寻味。



陈迎晖 / 摄

北宋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他每每痴迷地望着衡州西湖成片的白莲，浮想联翩，感慨万端：“每年夏六月始花，一般盛于月中。若三五之夜，恰雨后云雾，白莲受天地

雨露滋润，竞相怒放，是时，月华如昼，花月交辉，满湖缟素，如皑皑白雪覆地。白莲绿叶间点缀着一朵朵红莲花，有如三春天桃，白里透红，红里露白，红白相映，满湖锦绣。热风徐来，株株荷花点头起舞，缕缕清香随风飘洒，满城香透，沁人心脾，令人销魂……”

他还表明自己爱莲的心迹“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灵魂深处对“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莲怀着崇高敬意。

痴痴遐想中，我仿佛一直站立到秋天，那时茶亭的荷莲一定是“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男女泛着一叶轻舟，穿梭于荷花之中，满载着丰收的喜悦。而到夜晚，临水而建的仿古精美的亭台楼阁必定

灯光灿烂，歌舞升平，两岸相爱的恋人在柳荫下卿卿我我，对面茶座中文人雅士正品着好茶说说笑笑，享受着荷塘月色。祥和的生活一派喜气……

黄文焕与姬岩

戴云飞

永泰的历史，差不多便由张、黄两姓书写。张氏家族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黄氏家谱也不甘落后，多有出彩篇章。黄文焕、黄任、黄龟

年、黄定，就是其中精彩的页码。

黄文焕，白云乡人，自幼在姬岩读书。明天启年间进士，当过几任县令，政声文声远播，破



永泰姬岩寺

格提拔为翰林院编修。官不算大，却耿直敢谏。因与黄道周等人登坛讲学，纵论当朝是非，被捕下狱，后客死他乡。

姬岩位于福州市永泰县白云乡境内，距县城23公里。主峰大帽山，海拔1237米，屹立于永泰、闽清、闽侯三县交界处。姬岩名称的由来，有许多种说法。之一是，因山上奇峰怪石犹如天外飞来，故称飞岩，来历相近于杭州灵隐寺旁的飞来峰。五代时，闽王王审知曾偕同爱姬，到闽清抚慰素来交好的黄敦遗孀陈氏，顺道登白岩，并来到毗邻的飞岩。王姬见飞岩山水毓秀，慨然喟叹：百年后若能得此宝地长眠，那就心满意足了！后来王姬在福州的墓穴被盗，陈氏按照王姬生前的意愿，将其骸骨移葬飞岩，“姬岩”因此而得名。如今，王姬埋香处已不可寻，但这种说

法，仍比较可信。

黄文焕从小在姬岩长大，对姬岩的风物，了如指掌，并怀有深厚的感情。黄文焕咏姬岩诗有“为问山中真面目，漫将色相较名姬”句，可见对姬岩评价之高。入仕后，他始终不能忘怀于这一方山水，中间曾有几年辞官回乡，致力于乡村教育以及姬岩的景致建设。在黄文焕的倡导下，白云黄氏“不辨四声者无一家”，姬岩也得到殷勤的呵护。后来黄文焕不得不再次踏入仕途，“一戴乌纱，身为国有”，深深遗憾不能亲自守护姬岩的山水，又怕无知无识者肆意践踏，写了封《与僧善缘书》给姬岩寺的僧人，谆谆嘱咐要善待姬岩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

《与僧善缘书》是一篇奇文。不只是对姬岩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更因为所提



出的山水保护与改造的理念，十分值得后人借鉴。因原文篇幅较长，不能照录，在此不避抄袭之嫌，尝试用最明白易晓的语言意译，并不揣冒昧，加以点评。

“奇绝的山水，多处于幽峭。但陡峭常常让人觉得狭窄，深幽又显得暗淡。唯独姬岩，虽然幽峭，却在绝顶之上，豁然开朗，单凭这一点，姬岩也足以傲视群峰而独立了。天公造物，到姬岩这里，已经是极致的完美。人若想要不自量力加以改造，一不在意，怕只会给山水留下缺憾。”黄文焕这样写道。

“姬岩之美，岩石是她的本质，林木则是她的靓妆。树木长在岩石上，十分艰辛不易，哪怕是一花一卉，都可珍惜赏玩，如珍珠般宝贝。稍大一点的树木，须得经过几百年才能长成，那就像是数丈高的珊瑚，更是国宝啊！以前曾有寺僧随意砍伐林木，真是天大的罪过。以后凡有乱砍滥伐者，樵夫送官追究，僧人赶出寺院。”黄文焕继续写道。

“听说有皈依人要在山门外的园中起盖静室，这个地方的景致，可亭可榭，值得好好布置。但在石室中起盖房屋，要建得雅致，十分不



易。倘若造得俗气粗笨，只能成为山水的累赘。就像现在的寺院，不用瓦片，却用木料遮盖，这是农家的房子，哪是神仙的居所？以后终究须得拆去！皈依人有银两要盖屋子，我也不能制止，但要细心谋划，宜小不宜大，宜雅不宜俗，不要有围墙。如果没有盖好，只会败坏山水佳趣。岩石旁边，哪里可以设台建亭，哪里可以架桥筑梯，我都一一安排好了，回去后我当亲自料理。作为僧人，能保护好姬岩的岩石草木，就是好僧人了。房屋想是已经起盖了吧？可惜我不能在家，加以监督。”黄文焕深自担忧，只能这样反复地告诫僧众。

赞颂姬岩的诗文，数以千计，但大都只是描景状物，平铺直叙，絮絮叨叨，了无新意。黄文焕只寥寥几句，就道出了姬岩山水胜景的真谛。永泰近年新兴的旅游景点，多为峡谷瀑布。自是有人喜欢曲径通幽处，我却觉得行走其间，有一种压迫感，因此，独钟情于高盖山、方壶山和姬岩。站在山巅，天蓝云白，极目千里，心无滞碍，尽可一吐胸中郁气！以上几座山，都是永泰的仙山，看来神仙才最懂得选地方。

仙山能够得到有识之士的庇护，则是山之所幸了。永泰曾经林木茂密，若干年前，仍有成片的原始森林。不知有多少木材，通过大樟溪放排源源不断地运出？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最后一劫，山上的树木几乎砍光。姬岩能够较好地保存许多名木古树，黄文焕功不可没。

黄文焕最终也没有在有生之年回到让他魂牵

梦萦的姬岩，原因是出狱后凑不到回家的路费。死后的灵柩，也是在他人的资助下，20 年后才运回故里。黄文焕的遭遇，比黄龟年要悲惨得多。

忠言逆耳，言多必失，读书人不会不知道这样的古训，但历史上怎么还出了那么多死谏的文人呢？文人常以竹子的虚心高节自喻，“未曾出世先有节，直到凌霄仍虚心”。姬岩山上生长着一种方竹，外方内圆，有规有矩。黄龟年、黄文焕的高风亮节、人品端方，正是这方竹的品格哩！



与僧善缘书

黄文焕

水之奇艳者多幽峭，不峭不幽，不能生奇。峭近隘，幽近惨，使人喜畏参半。独姬岩从绝顶中舒发阳光，轩豁天开，错落散布。峭不入隘，幽不带惨，真足以俯群胜而只立。每每署中念之，心腑飞动。综其胜概：天公好事，此已极；人力映带，缺憾尚多。我既读书此山，自当为天公作一帮手。而一戴乌纱，身为国有，拟以覲行顺道，抵家履岩，商量如何点缀，而时日迫程，未可以返山中。吃紧事略为汝宣之。山体以石为本质，以林木为靚妆。林木之滋生于石上者，艰辛殊甚。虽或一卉，皆可爱玩，如得珠玑。其略大者便若数丈珊瑚，烂然国宝。且其生长皆经数百年，神灵呵护，方有今日。奈何轻付斧斤！前者砍伐神仙第一家诸木，深可痛恨，便当驱遣诸众出寺。既从宽政，应当将功赎过。山风迅劲，不宜树松，须觅杜钟木遍树之。此木体魄既伟，干能疏，叶能密，萧疏欹侧，俨若图画，此靚妆中之最妙者，多多益善，速觅为贵。

岩傍前后左右凡有大木，皆禁工人不许取以为薪。至近在石上，则虽小木亦不得伐。珍其素，录其奇，他日布置，才有着手处。仙室之左，有三石鼎立，所在尤多大木。前者本岩众尝樵采于兹，兹应禁之。林中木非石上者，小木不妨砍用，大木则宜留存。如此分别，便是山川有

幸。今乃全林尽砍，使山化为髡，居住大罪，孰大于此！以后若复伤坏大木，工人送究，僧众出寺。吾为山林拥护，为天公帮手，不得不郑重也。

近有皈依人，欲在山门外园中，起盖静室，此处数石在上，差有光景，足资布置，可亭可榭。然岩宇中起盖，大非易事，安排泉石，料理花草，非大经济人不办。倘俗气粗笨，布置不雅，即为山水之累。现在仙室经众人起坏，足以为戒。仙室佳处，全在片瓦，片瓦轩朗，乃见奇怪。今皆以木料遮蔽，片瓦才如一掌，此是人家房子，岂是仙家景况哉？今姑仍之，后终当拆也。皈依人亦自有银盖屋，吾所不禁。然宜小不宜大，宜雅不宜俗，宜参差作静室，不宜围墙。又须稍离石下，不宜近石数十步，吾将留以为他日起亭之用，妆点山水胜概。如乱起，坏却山水佳趣，则到后又须拆换，为可惜耳！岩中某地应有亭，某地应有台，某洞应构桥，某洞应设梯。吾俱安排历历，俟之庚午再朝覲后，便即过岩料理。唯尔辈寺众，勿损坏山中木与石，便是佳僧，他无所过督也。盖屋想已起手，恨吾不得在家指点。然不宜大，不宜围墙，决须依吾所嘱。此处风水攸关，发掘太大，有伤地脉，故须细心也。

吾前与护法有成约矣，吾与护法共护此山，护法出其灵，吾出其心。护法之灵，既不足以摄人魄而震人，损坏则吾责护法，护法其何辞以应？吾之胸臆，若不能竭力摅智，而增色山川，则护法责吾，吾亦无辞以应。烦诸大众共领此意。

远去的鼠疫灾难

潘 亮

鼠疫，患者死后通体发黑，故被称为“黑死病”，在世界上曾有三次大流行，死亡无数。20世纪后期，全球人间鼠疫渐渐被控制，但鼠间的鼠疫却并未平息。因此，鼠疫迄今仍被列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之首。在20世纪30-40年代，抗战、内战期间，鼠疫与战乱交相肆虐，福州人也曾谈之色变。如今，这一恐怖岁月早已远去了。

一、福建的鼠疫灾难

福建，曾是鼠疫肆虐之地。据防疫专家田野调查证实，1884年间，鼠疫已从香港传入厦门。其实早在明代，福建或已有流行，只是当时尚未称为鼠疫。1884年的大流行，疫情沿水陆两路向福建全省蔓延，至1952年，流行达68年，造成71万多人丧生。1896年莆田大流行，“商店停业如罢市，市面萧条达四五个月之久”。20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瘟疫与战乱结伴而来，福建

发生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年发病2万多例，病死率80%以上。患者以腺鼠疫为主，占90%以上，福州人称为“脖核”（颌下淋巴结肿大）。常可见横卧街头，欲求医但无钱无助的鼠疫病人，民众、官方、医护人员都畏之如虎，有些贫困病人就横死在医院门口或街头巷陌间。

1933年，龙岩县东门外平等乡发生鼠疫流行，患者30余例，1934年5、6月间，苏溪头又发生8例鼠疫，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令厦门海港



防疫人员在木制的隔离柜里从事鼠疫菌的鉴定

检疫所派员会同驻地的陆军第二十三后方医院协同开展防疫工作，经2个月扑灭，疫情平息，但当年11月初，在大洋乡又发生鼠疫。1935年4月，雁石、城关北门三民坊、大洋乡、曹溪、苏溪头、集美乡相继发生鼠疫，至6月中旬，疫情快速蔓延，当时龙岩县城人口仅7000多人，染疫而死竟达300多人，当地军政当局急请驻闽绥靖主任转报中央，派员支援防治。8月，中央卫生署派杨永年技正带一批技术人员来闽指导防疫，于12月1日，在龙岩成立“龙岩鼠疫防治实验区防疫所”，承办鼠疫防治各项工作。当时工作主要包括：1. 鼠疫流行状况调查；2. 预防工作，包括：死亡报告、强制交通检疫、病人住所消毒、扑灭及检验鼠类、普遍强迫预防接种、隔离治疗（设立隔离医病用血清治疗）、尸体集中火化、气象测定（已明确鼠、蚤等生活周期与气候有关）、防鼠灭鼠，对防疫人员、医师、工程队员、技术生等人员均进行培训，及其他辅助工作等。

1936年秋，闽北鼠疫暴发，在建瓯设防疫所，政和、松溪两县设防疫分所，为比较福建鼠疫流行特点，又在同安、莆田设防疫队，并将龙岩防疫所更名为“闽西防疫所”，将建瓯防疫所更名为“闽北防疫所”。1937年春，闽南鼠疫暴发，5月在晋江成立“闽南防疫所”，在惠安添设防疫分所，在福清、仙游设防疫队，为统一指挥全省防疫工作，在晋江设立“福建全省防疫总所”。1942年南平茂地乡宝珠村暴发鼠疫，“正值秋收大忙季节，通常在这个季节里，农民都是起早摸

黑，早出晚归，忙于秋收。但由于鼠疫流行，村民普遍心灰意冷，无心生产”，“其损失虽无统计可考，然为害之烈，确有甚于洪水猛兽者，揆数十年各地之流行史实，每有昔为热闹市区，一经鼠疫蹂躏，顿成无人废墟”。抗战期间，日军在宁波投掷鼠疫炸弹，引起爆发，疫情随避疫人员带入临时省会永安，引发鼠疫流行。驻扎在吉山的省防疫大队和省卫生实验所、卫生处附属省立医院等机构和人员全力投入扑灭疫情工作，并紧急生产相关消杀、灭鼠、疫苗等物品供应闽浙赣各地。在永安，采取捕鼠奖励办法，病人尸体集中在下渡统一火化处理。

鼠疫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算，并给原本十分贫困的民众增加了额外的生活负担和治疗费用。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治疗鼠疫的药物都十分昂贵。如泉州中医治疗鼠疫主要用“活血解毒汤”，因药中有一味不容易得到的“西藏红花”，致使每剂价格高达八九百元。西医治疗鼠疫主要用鼠疫抗血清，一针血清的价格从700元涨到2000元不等。鼠疫发生时，民众还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如迎神仪式、做道场、建醮祈福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费时耗力，而且要花不少钱，并随人群聚集增加流行风险。如1942年邵武堂口发生鼠疫，一月之内病倒数百人。“迷信者大言不惭，说此道彼，甚至发起迎神禳灾。闻只此次迎神即耗去万元以上钞币”。1945年建瓯爆发鼠疫，民众“平均每月一次神鬼游行，统计各庙宇题募的金钱已达亿元以上”。1939年福建省政府

秘书处编撰的《福建卫生建设之经过》对鼠疫造成的损失做了大致估算。如按每人每次病所需医药费及停止劳动所受之损失，平均以5角计算，则835512个病人的损失为417756元。至于因死亡所受之损失，如以每人平均年龄为20岁计算，此20年中，国家和家庭所负担之费用如平均每月以3元计，依照中国银行存款复利计算，则20年总需1900元，则712446个死者的损失合计总数为1354065156元。这对近代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鼠疫流行，扰乱政府工作，致使停课停产停工，人们四处逃亡，谣言流行，游医猖獗，社会一片混乱。

福州诗人洪梦湘早年任职于福州英华中学。1941年4月21日福州首次沦陷，他在此前即随校迁往闽北顺昌上洋镇（今为洋口镇），用一首诗记述了当地遭遇鼠疫的凄惨时况：“全镇仅千家，日死数十人。时疫甚祸水，生命等轻尘。丧夫才东屋，哭子又西邻。入耳声凄楚，满眼景沉阴。鼠且衔尾走，人焉以保身。当道不过问，亦枉哭高坟。嗟嗟离乱日，咄咄苦难辰。我生何不幸，作兹历劫民。”（当地鼠疫流行，鼠群异常迁徙，相互衔尾渡过富屯溪，到远处“避死”，又将疫祸带到新的地方）

二、福州的东南鼠疫防治处

1946年7月，中央卫生署在福州秘书巷（今省医科院址）成立“东南鼠疫防治处”，附设隔

离医院，统筹闽、浙、赣、粤4省鼠疫疫情监测及防治工作。处长为左吉，副处长翁文渊，委员中，有美籍著名防疫专家、《鼠疫概论》作者之一伯力士博士（R. polliTzer, 1885-1968年）。统筹东南4省鼠疫防治重任、做了大量工作的东南鼠疫防治处，每月经费仅有美金3000元。直到1948年10月，才获得美援补助费美金8万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办医院、搞防疫注射、消毒、做宣传、做统计、开班培训防治鼠疫的医务人员，功不可没。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自从东南鼠疫防治处成立以后，鼠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患者病例数、死亡数均大幅下降。以福建省鼠疫疫情为例：1946年闽省患者6141例，死亡2255人；1947年闽省患者1542例，死亡695人；1948年闽省患者602例，死亡280人。1949年1—6月份闽省患者174例，死亡54人。尤其是1948年全年，曾经鼠疫猖獗的厦门本岛，未发现一例鼠疫患者。1947年12月9日，东南鼠疫防治处在厦门筹备设立“鼠疫隔离院厦门第一分院”，委派查海琛为院长，地址在豆仔尾市隔离院楼下（今美头山路部队干休所）。1949年4月5日，民国厦门海港检疫所邀请尤美祖博士，为检疫人员讲授“鼠疫之防治”及“最近欧美新药之应用”。尤美祖医生曾由国民政府中央医防总队选派，赴美研究细菌检验，1949年初回国后，被派往东南鼠疫防治处工作。当年6月7日，东南鼠疫防治处派尤美祖医生等4人工作组，携带大批灭鼠、



前为作者母亲，后为一位来自邵武籍的护士，背后建筑就是东南鼠疫防治处隔离医院。这里，当时被福州人视为“鬼门关”，鼠疫病人被集中隔离在此治疗，经常有死人。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职业是极其危险的。但她们的笑容依然淡定、阳光和灿烂

灭蚤等防疫器材来厦，展开防疫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美祖任厦门市防疫站站长。

我母亲出生于1925年，现已九旬高龄。我外祖父是个传道的牧师，早年毕业于省会教会学校，粗通些医术，毕业后被派往古田开办教堂，外祖母也在教堂里帮忙。正是由于这重关系，我母亲得以在福州的柴井护士学校免费上学，毕业后分配在建瓯中心卫生院工作。1945年，台湾光复，向闽粤两省招聘医疗人员，她便随我父亲一同应聘到台湾淡水行医并兼任海港的鼠疫检疫工作。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医院被捣毁，父母被迫返回福州，父亲在省立医院，母亲在东南鼠疫防治处隔离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她护理过很多鼠疫病人，并且还护送一位英籍商人经香港回

国。此人因被疑似鼠疫患者，后虽被排除，但本人受惊匪浅，坚持马上回国。我父亲在为位腺鼠疫病人诊查时，曾被病人污血喷吐满面。

东南鼠疫防治处隶属民国卫生署，掌理东南各省鼠疫防治事宜。防治处下设防疫设施组、医药实验组、卫生工程组、细菌病理组和昆虫动物组，负责关于鼠疫流行病之调查研究事项、关于鼠疫防治之设计考核事项、关于疫情统计及工作报告事项、关于鼠疫防治人员之

训练事项、关于交通检疫之设计实施事项、关于鼠疫管制之其他紧急措施事项。东南鼠疫防治处得设隔离医院、检疫站及鼠疫防治人员训练班，其组织规程由卫生署拟订，呈请行政院核定之。

三、扑灭鼠疫，终结灾难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那天，阴有小雨。父亲原省立医院内科医生，因不愿被联勤总部征调赴台而被除名，在大根路开业行医。他原本随街坊一道上街欢迎解放军，见路边有不少解放军伤员在休息，伤情急需马上处理，遂临时联系上一位解放军领导，让他赶快组织这些伤员到附近他的诊所去做些紧急临时包扎处理，以免

感染化脓。并让街坊跑步到我家，通知我母亲多带些黄纱布和消毒药品，赶快到诊所帮忙。父母以这种特殊、朴素的方式，迎接了解放军的到来。

东南鼠疫防治处经人民政府接管后改组为福建鼠疫防治所。正是这个已被人遗忘的防治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终结鼠疫灾难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0年，全省第一届防疫工作会议召开，首届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亲自到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消灭鼠疫！此项重任自然落在了福建鼠疫防治所肩上。防治所在鼠疫重点区建立了14个鼠疫防治站，并逐步调配专业人员500余人。当时战争刚刚结束，福建各地匪患猖獗，防治鼠疫战线上的卫生工作人员既要与自然灾害抗争，处置危险的鼠疫疫情，还要与流窜的残匪斗争。1950年2月，防治所接到政和发生严重鼠疫的报告，当即组织一个9人的防疫组，携带长枪8支、短枪1支和药械，迅速赶往疫区防治。防疫工作比较顺利，但返回途中经建阳时，在距县城20公里的街河口，遭遇了武装土匪一个营的伏击。当时，为了护送防疫组成员，建阳县组织了一个武装连队，但兵力不够，连队中3人当场牺牲，2人被俘。最后在附近驻军的增援下，才把敌人击退。在多次遭遇战中，萨木勒、超古浪、段全泰等13位烈士在福建鼠疫扑灭战中光荣牺牲了。其中萨木勒、超古浪是内蒙古防治鼠疫的专家，是卫生部应福建省卫生厅的要求，派来指导福建防治技术工作的。福建各

界沉痛悼念，张鼎丞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

福建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和牺牲所吓倒，向鼠疫发起一场接一场的战略性总攻。控制“鼠疫、霍乱、天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是省人民政府抓卫生工作的头等大事。其中又将鼠疫列为“三恶之首”，称为“一号传染病”。1950—1957年，原东南鼠疫防治处副处长、鼠疫专家张昱任福建省鼠疫防治所副所长，身处战火中心，责任与压力可想而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在福建防治鼠疫期间（1950年），为摸清家鼠鼠疫的发生和流行规律，我独创一种杀鼠灭蚤的药剂，并亲自带人上攀房顶，下钻床底屋角，遍寻鼠、蚤滋生繁殖的巢穴，进行足量有效的药物喷射，后又堵塞鼠洞，反复进行，致鼠、蚤大量死亡。形成经验，在各地推广，鼠、蚤同灭。在1952年9月，鼠疫灾难在全省宣告结束，祸国殃民的鼠疫至此销声匿迹。”这段自述，形象描述了张昱在防控鼠疫这一特殊战场上的贡献。张老1933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抗战爆发，他在平凉天水公路卫生站任主任，冒着日机疯狂轰炸的极度危险，无数次出生入死，抢救伤员，保公路畅通，这段岁月惊心动魄。抗战胜利后，他获得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第6666号），据悉当时全国卫生系统仅获得13枚。

福建为扑灭鼠疫，发动了专家、社会多方力量，广泛调查，鼠蚤同灭，针对特点，取得极大成功。天花、霍乱、痢疾等多种严重传染病也都得到有效遏制。这期间，翁文渊、于恩庶、张昱

等老一辈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48年，于恩庶应邀南下福建东南鼠疫防疫处，此前他在沈阳主持了鼠疫扑灭工作。解放军进驻福建初期，正值鼠疫流行，当时没有防治药品，他奉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赶制鼠疫死菌苗和活菌苗数百万人份。为确保安全，他在每批次疫苗发出前，先在自己身上大剂量接种，确认试验安全后，再签字发出供应军民注射，使难以计数的人免受鼠疫感染。为此，他得到省政府表彰。



翁文渊先生

翁文渊，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医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北平卫生事务所医师、中央卫生署专员，以及广西省卫生处

处长、杭州市卫生局局长等职。1948年，为支援福建防控鼠疫疫情，他受中央卫生署指派，南下福州担任东南鼠疫防治处副处长，从此在福建扎下根，为福建卫生事业奉献毕生。翁先生根据现场调研，发现福建鼠疫流行有其独特性，总结出流行规律与特征，提出应当“鼠蚤同灭，控制疫区”的方略，亲自筹划生产各类消杀灭蚤药剂，为3年内扑灭鼠疫做出卓越贡献。他与吴云鸿、于恩庶、张昱等专家被表彰为“鼠疫防治功臣”，先后培养了黄松光、田文琪、陈书民、黄爱桦、郑祥开、洪震藩、严延生等福建鼠传疾病防控的骨干人才。

福州解放前夕，翁先生坚决抵制将东南鼠疫防治处迁移台湾，听从中共地下组织安排，组织防护团，使鼠疫防治机构和一批专业人才完整保留，为随后鼠疫防控做出杰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受国家卫生部委派，以鼠防专家身份，奔赴当时鼠疫疫情较为严重的云南、青海等地支援工作，取得突出成绩。1960年被评为“福建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翁文渊是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之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统战、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至1953年，流行福建长达68年，造成71万多人死亡，祸害无穷的人间鼠疫疫情终于被彻底扑灭了，并长期维持有效监测和防控，迄今未见死灰复燃迹象。鼠疫肆虐的岁月已然淡远，但那些惨痛的历史不应轻忘，那些为扑灭鼠疫而牺牲、而奉献的人们，永远值得学习和缅怀。

诗钟和志社

郭道鉴

一、诗钟是什么

诗钟是福州文人在诗歌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创造。诗钟所以得名，是因为诗人在集会写作时利用特制工具焚香限时，在香上系钱，下端缀以

铜钱，香焚线断，钱落下面承接铜盘中，发声如钟，便立即收卷，这种创作方式就称为诗钟。诗钟，福州通称折枝诗，一般认为它是严格按照诗词格律关于平仄和对偶的要求写成七言一联，相当于七言律诗的颔联或颈联，如同从七律诗中折下一枝，故称折枝。



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钟雅集活动

根据现有资料考证，福州诗钟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道光、咸丰间开始盛行，不少学养甚高的名宦硕儒如林则徐、陈宝琛、沈葆楨、林纾、陈衍等亦喜以此消闲，无数专工诗钟的诗社相继成立，佳句迭出。诗钟创始于福州，后来逐渐推行到全国和海外华人聚集之处，但多以福州人为之最工，至今仍然是福州最为盛行，因此福州曾经有“诗钟国”的赞誉。

诗钟所以能为人们所广泛喜爱，是因为它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是文学创作上艺术性、应用性和娱乐性的完美结合。

诗钟的艺术性表现在它体现了中国方块字一字一音、音分平仄、便于吟唱、可以随意组合、排列整齐的特点，也体现了它可以借助语法的知识和各种修辞技巧的应用炼字遣词，用精美的文字来构造诗歌的美妙意境，反映内在丰富的感情。

诗钟的应用性，首先是因为诗钟相当于七律诗中有对偶的一联，体现古典诗歌的精粹和特色。学写诗钟，可以帮助人们掌握诗词格律，积累大量词语，熟悉汉语语法和修辞技巧，提高文学修养，懂得如何炼字遣词，为初学诗者提供入门阶梯，并不断提高创作水平。此外，诗钟虽然只寥寥14字，同样可以言志、抒情、写景、叙事、说理，发挥文学创作的多方面功能，因此有广泛的应用性：它可以用于文人雅集，以联络感情、切磋文字；用于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婚嫁、寿诞、迁居等庆祝活动；用于社会团体举办某种纪念活动。

诗钟的娱乐性首先表现在创造了花样繁多的创作方式，既饶有趣味又有相当难度。诗钟分空咏、分咏、专咏三类。空咏即嵌字，最为流行，它又有正格和别格之别。正格即随意指定两个字称为“眼字”，分别嵌于上下联一至七字对应位置上组成一联，称一至七唱。“眼字”一般都是临时翻书信手指定的，其词性或词类往往差异甚大。别格则不限二字且分嵌在上下联的不同位置上，如两字分嵌在上联之首和下联之末的“魁斗格”，两字分嵌在上联之末和下联之首的“蝉联格”，三字分嵌在上下联并不得连缀的“鼎峙格”，四字以上分嵌于上下联之中亦不得连缀的“碎锦格”等，共有十余种之多。分咏则是随意指定两个题目分别作为上下联吟咏内容，这两个题目往往毫不相干，甚至或庄或谐，大异其趣。专咏则是临时指定一个题目来写或限以某字嵌入联中。分咏和专咏都要求避题字，以增加难度。

同时，诗钟利用特制工具，即席创作，限时交卷，隐名评选，创造了特有的文字竞赛方式。限时交卷，一般要在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内至少要完成空咏三首或分咏二首。因此作者要快速反应，全神贯注，展开想象，发挥联想，充分调动平时积累的全部书本知识、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来炼字遣词，营造意境，写好作品，这个过程是十分紧张的。及至鸣钟交卷，则又如释重负，而在突破了某种创作难度之后更有一种胜利者的喜悦。最后在评选宣唱阶段，在悠扬吟声中，欣赏评选出来的佳作，回顾自己作品的得

失，更充分领略到这一文字竞赛方式带给人们的无穷乐趣。

由此可见，诗钟的娱乐性是来自于高雅的文学创作活动，并非单纯的文字游戏。那么，诗钟是不是诗？当代最负盛名的诗钟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俗文学学会诗钟研委会主任王鹤龄认为诗钟应归入杂体诗一类，我认为这是可以商榷的。当然诗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留待另文说了。

二、志社昂立有诗楼

在福州南台大庙山上雄峙着一座诗楼，是全国仅有的由福州志社诗人创建的诗楼。

志社为福州著名诗社，创立于1908年，由蒋逢午、翁心组，张一琴（鹤廉）等主其事。

1916年由社人集资在大庙山去毒社戒烟局原址建起砖木结构二层诗楼，作为集吟之所。诗楼由陈宝琛题匾“志社”，立有碑记三处：一为陈衍撰，洪亮书；一为林苍撰，萧梦馥书；又一为唐瀚波撰，陈谦搗书。1922年大庙失火，诗楼亦遭焚毁，翌年重建，当年林纾题匾“诗

楼”亦毁，后由萧梦馥于1934年为补题匾。陈衍作有《志社诗楼触景偶作》一联：“最怜是秋色西来，剩此满林黄叶；有感者大江东去，尚余几个闲鸥。”1994年，诗楼又因倒塌拆建后恢复原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楼因在福州第四中学校区内，划归校方管理。

大庙山上有不少著名古迹。秦末，无诸从诸侯灭秦，又助刘邦伐楚有功，汉高祖五年（前202）被封为闽越王。无诸在此山上建台受汉册封，台遂称为越王台。山旧名惠泽山，因后人为纪念无诸，曾在山上建有闽越王庙，俗称大庙而改名大庙山。又传说无诸之子余善曾在山下大江钓得白龙，遂在山上建钓龙台，江亦称为白龙江。现在庙、台均已无存。大庙山还是登高胜



西湖宛在堂

地，山上有陨石所遗的巨石，名登高石。年年重九，人们来此登高，踩踏登高石，引发乡愁。山上尚立有摹刻米芾字迹的“全闽第一江山”石碑，更令人流连胜景，豪情满怀。人们追念当年志社诗人在诗楼联吟之余，在山上寻幽访胜，赏花步月，真是何等快意的事。

志社成立即以诗言志为宗旨。1958年值60周年社庆，即以“言、志”一唱征诗集吟纪念，征诗共分十门评取，另遗珠评取四门。选句有：“洗愆转德人言酷，卫道难淫我志纯”（魏道涵），“贬褒旨或微言寓，黜陟名无大志关”（高茶禅），“本色不彊吾志砺，直声如炙一言规”（江瘦影），“喜谗易被谗言入，知耻能教斗志持”（郭洪子）。1998年值百年社庆，由中国俗文学学会诗钟研究委员会、省诗词学会、福四中、省地方志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举行“厚、今”六唱征诗，应征者有25个县市及港台诗人共200余人，得诗1224首，由正捐取十二门词宗评取。选句有：“敷仁庶可恢今局，植德无难固厚基”（台湾陈实懽），“起衰世尽讴今政，问暖人犹感厚情”，“但得言行存厚道，莫教俯仰愧今生”。众人在福四中会议室评唱给奖后，集体到邻近志社诗楼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志社停止活动，其成员基本上都转入福州三山诗社。

三、诗人高会吉祥山

过去为庆祝私人寿诞而举行的诗钟集会规模

最大的，应是1948年萨镇冰90诞辰的祝寿活动这一次。

1948年2月，萨老90寿诞时，省政府、省参议会及各界知名人士联合为其祝寿，举行“高、远”六唱征诗，参加者数达千人，投诗万联以上，由二十多门词宗评卷，评唱发奖会场设在福州吉祥山救火联合会大礼堂内，历时三天两夜，盛况空前。萨老亲自上台吟唱其所作诗钟一首，“欲平物价唯高压，滥出金圆岂远图”，指责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物价飞涨，滥发金圆券，民不聊生，抒发老人的爱国情怀。老人还在会上展示了他近日新拍的一帧骑马照片和上面所题诗句：“行年九十，壮志犹存，乘兹款段，北望中原。”是他老当益壮的生动写照。

福州著名诗人陈海瀛特为诗会撰写一联：“山本吉祥，诗人高会；堂称仁寿，将军远名。”联中嵌入“高、远”两个诗钟“眼字”和“吉祥山”“仁寿堂”两词。吉祥山为福州著名制高点，气象雄伟，此次诗会即选址于此。仁寿堂为萨老晚年所居处，在冶山东麓中山大院内，系1938年2月，为庆祝萨老80寿辰，福州人士及旧时袍泽陈兆镛等50余人捐资购置。堂上下两层，依岩而建，岩有石刻“唐裴刺史毬场故址”。1948年萨老90寿辰时，原捐资建堂人士又立碑“海军上将萨公仁寿堂碑”，碑文由陈兆镛撰写，丁超五书丹。萨老晚年在仁寿堂安居，直到1952年4月10日病逝，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其侄伯森、侄孙本珪辑其遗诗为《仁寿堂吟草》，黄寿祺作序。

金狮山恩仇录

林文政

争 墓

翻开民国二十二年（1933）5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那一天，国民党正马不停蹄地围剿红军，少帅张学良正在威尼斯会见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在这条国际新闻边上，有一条发自福州的新闻：“江屏藩被刺案十三日提起公诉。”死者江屏藩是闽海关监督兼省建设厅代厅长，这名高官为何死于非命，刺客是谁，他们之间有何解不开的恩怨，成了当时福州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在封建社会，官民对立严重，为官的仗势欺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那些暗杀权贵的刺客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例如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刺马案”，扑朔迷离，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历经各种演义改编，早已脍炙人口。

然而在“刺江案”中，遇刺的江屏藩却并非封建势力的代表，相反，他曾是进步青年，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故友。1903年，林森在上海三山会馆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联络海内外闽籍志士开展革命活动，20岁的江屏藩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同盟会成立，林森与江屏藩等学生会会员都入了会，成为革命中坚力量，为辛亥革命贡献了一份力量。20年后，江屏藩是怎样信念动摇、欲望膨胀，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呢？

原来江屏藩虽是革命党，却笃信命运，迷信风水。他的父亲葬在东门外的金狮山上，风水先生告诉他，金狮山是个“凤环龙绕”的风水宝地，于是他想将自己的生墓也建在金狮山上，好福荫子孙，但金狮山此时已有一位墓主，并建有两座坟。

这位墓主叫黄三佛，两座坟分别埋着他的妻子和父亲。黄三佛又名黄时杰，福州东门外后浦乡人，原配妻子杨氏是童养媳，尚未结婚就不幸早逝。黄三佛将妻子葬于先父墓旁，背井离乡到

台湾谋生，在屏东当了个裁缝，与继室生养了子女。江屏藩倚仗权势，将本来不存在的墓地所有权问题向闽侯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开始长达4年的讼争。双方虽然都有契据，但闽侯地方法院依然判决黄家占了江家地界。1932年旧历三月间，法院执行庭勒令起迁。黄三梯接到老家寄来的书信，怒不可遏：“江家的墓有风水，能做厅长，怎知黄家的墓就没有风水，就没有人能做厅长或者省长呢？江家的风水重要，就可以霸占别人家的风水吗？死者为大，逝者为尊，黄家的祖坟岂是说动就能动的？”不久黄三梯再次收到老家来信，说协商未果，杨氏之墓已遭强迁，其父黄述秀的墓也被强制拆毁，望他速回。

黄三梯火急火燎地赶回福州，跑到金狮山上一看，傻了眼。祖坟已面目全非，围起了一堵长50米、宽30米、高2米的水泥墙，妻子的墓已被刨开，黄土中散落着棺材板和石块，20多个民工在墓地上忙碌着，搬运敲打着石块。而父亲的墓则被夷为平地，墓埕上搭建起了一间临时厕所，供民工方便。中国自古就有“掘人祖坟，不共戴天”的说法。黄三梯没有想到，这位厅长不仅挖人祖坟，还叫人在坟上拉屎撒尿，实在是奇耻大辱，欺人太甚。黄三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黄三梯跑到省政府，找江屏藩要说法。可是厅长哪里是想见就能见到的。黄三梯静坐在省政府门口，大声喊冤，控诉江屏藩的恶行，引来不少围观群众，很快就被几个警察以扰乱秩序为

由控制了起来。江屏藩知道黄三梯迟早会找上门来，叫属下转告他：“现在都民国了，什么都讲法律，你在这喊冤有何用？有种你就去法院告我。”4年的官司让黄三梯倾家荡产，还卖掉了亲生女儿。接着两位侄儿、侄孙又相继死去。接踵而至的打击使黄三梯悲愤填膺，就动了刺杀江屏藩以报仇雪恨的念头。

刺 江

江屏藩于1930年任建设厅厅长时，在福州改建两桥，从中贪污，被检察官检举，曾引起民间议论，人言啧啧。黄三梯由台湾回到福州时，特意画福州大桥图，宣扬江屏藩舞弊贪财事实。他还带上戏衣戏帽按闽剧《知县斩》中知县的打扮，到东街光华照相馆拍了一张戏装照片。杀死贪官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渐趋强烈。

黄三梯料定江屏藩总有一天会上山视察修墓的进度，而竹屿村是上山的必经之路，他偷偷买了把锋利无比的鱼刀，埋伏在竹屿村的竹林里，等待江屏藩的出现。

1933年5月3日下午，大墓即将落成，江屏藩亲自上山监工。他乘坐人力车来到竹屿村后，步行上山。江屏藩对自己的大墓相当满意。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江家的大墓形如碉堡，宏伟壮观，“圻中有石椁四具，都是挑最细致的青石雕琢而成。除两具殓装其父母外，一具为其夫人附棺之用，尚余一具系江自备。”墓前“华表峥嵘，气

象森严”。角落建有圆形墓亭，所费颇巨。

江屏藩下山时，天色渐暗，轿夫依然紧随其后。眼看着暗杀计划就要流产，江屏藩忽然想起有什么东西丢在山上，令轿夫回头去取，自己则踱着八字步独自往前走。“苍天有眼！”黄三佛心中暗自喊道，他见轿夫走远了，抓住这百密一疏的机会，突然从路边的竹林里窜了出来，屏住呼吸，尾随在江屏藩身后走了几步，拔出鱼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到江屏藩面前，朝他脸上撒了一把石灰。江屏藩一声惊叫，眼睛如火烧般疼痛。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黄三佛已经如杀猪般，朝他的身上连刺了十几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江屏藩还来不及呼救，就一命呜呼，倒在血泊之中。等警察闻声赶到，将黄三佛团团包围的

时候，江屏藩早已断了气。黄三佛并不逃走，而是将鱼刀往地上一扔，大声喊道：“这狗官是我黄三佛杀的，我跟你们去自首！”

江屏藩万万没想到，阴宅才刚修好，自己就住了进去，真是自掘坟墓。黄三佛因为这块墓地遭遇强拆，卷入了一桩命案，江屏藩也因为霸占这块墓地惹来了杀身之祸，可谓两败俱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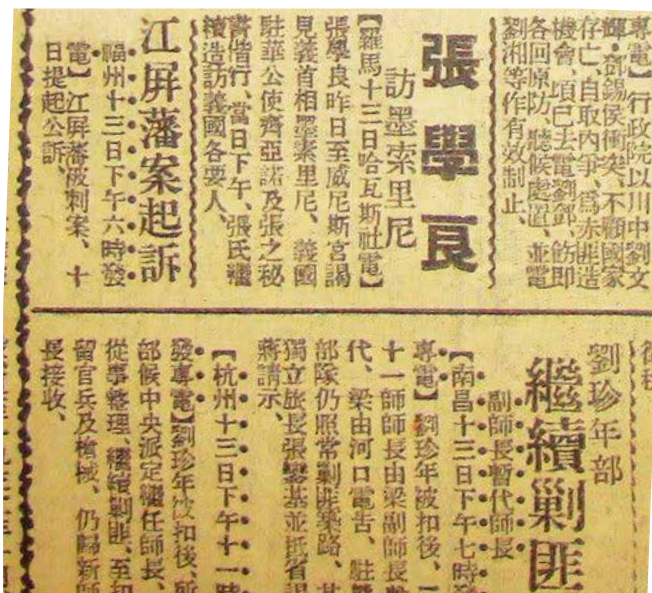
“刺江案”不仅轰动了福州和八闽，还惊动了中央政府。民国国府主席林森专程回福州为江屏藩送葬，还亲自过问办案情况。江家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定要让黄三佛抵命。

一边是民杀官，一边是官告民，法院的天平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了“刺江案”的进展。1933年6月4日的天津《益世报》

大篇幅刊发了《闽海

关监督江屏藩被刺案公审记》，

6月5日又刊登了一审宣判的结果：5月29日下午4时开庭宣判，“旁听者仍拥挤异常”，法警提黄三佛到庭后，黄三佛脱帽向法官及旁听者各鞠了一躬。院长在询问了黄三



《大公报》上关于刺杀案的报道

梯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后开始宣判：“黄三梯预谋杀人人处死刑，剥夺公权无期。”“黄三梯神色陡变，大呼不服，请院长宣示处死刑之理由”。院长令通译者让黄三梯画押，“黄初不肯画押，经通译再三解释后，始画押”。退庭后，黄三梯“一路尚刺刺不休”，他的家人决定为其上诉。

乡亲们同情黄三梯的遭遇，全都站在黄三梯一边，他们组织了“东门十三乡黄三梯后援会”，举着小旗和横幅在法庭内外声援黄三梯，要求赦免黄三梯死罪。当局慑于老百姓的压力和新闻界的监督，不敢对其刑讯逼供。法庭辩论是刑事诉讼上的重要程序，可是民国时律师的收费很高，台湾及南洋各埠的福州同乡会纷纷募资，聘请闽侯律师公会副会长陈衡铨为黄三梯做辩护。“刺江案”审理时间长达3年，其间被告3次更换律师，律师们全部竭诚为其辩护。一开始，辩护律师刘礼芳想以“疯癫杀人”的理由为黄三梯开脱，他举出了黄三梯拍戏的照片，但黄三梯自己否认说：“我没有疯癫，我就是杀了这个贪官。”两次审理，法庭内外都挤满了人群，人言汹汹，连法官都紧张得声音发抖。终于，法庭宣布：黄三梯免于死刑，改判有期徒刑。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黄三梯“以犯人之身易服从军”，奔赴抗日战场。在前线，他摇身一变成了伙夫，为将士们煮饭烧菜。没有人会想到，这位默默无闻的伙夫竟然是轰动全国的刺客。黄三梯家仇已报，他心里想的是把每一顿饭做好，让将士们吃饱喝足，上战场多杀几个鬼

子，为国雪耻。1938年，在一次战役中，黄三梯所在的连全军覆没，黄三梯也惨死于日寇的刺刀下，年仅49岁。后来其骨殖移葬于被强迁出的金狮山祖坟，紧挨着江氏墓园。

抗 日

尽管黄三梯只是一介伙夫，但在儿子黄昌登眼中，父亲杀贪官，上前线，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黄昌登1917年生于台湾，当时台湾处于日据时期，推行奴化教育，所以黄昌登熟练地掌握了日语，但是父亲始终不忘提醒他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父亲被捕后，黄昌登一直牵挂着父亲的安危。1937年，听说父亲以监犯身份从军，20岁的黄昌登决定回归故里。乡亲们把这位台湾归来的小伙子亲切地称为“台梯”。

次年，黄三梯以身殉国，台梯悲痛欲绝，决定留在家乡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以报杀父之仇。与父亲不同的是，黄台梯复仇的方式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他继承了父亲的侠肝义胆，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人的刺刀下挽救了不少父老乡亲。

1941年4月，福州沦陷，日军无恶不作，常常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拳打脚踢，还将每周三和周五定为“行乐日”。有一天，抗日游击队在后屿乡十字街狙击了“行乐日”来此奸淫掳掠的几名日本兵，还活捉了电话兵阿布文雄。次日，中岛少佐气急败坏地到后屿乡抓人，将十几个短发的青年绑在白马尊王庙前，扬言要将这些游击队

队员通通杀掉。在千钧一发之际，黄台梯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迎着枪口走向日军，用地道的日语告诉中岛少佐：“这些人都是良民，游击队都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哪会坐在家里等你们来抓呢？”中岛见这个年轻人相貌堂堂，举止不凡，还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以为此人有什么来头，命令属下放下枪口。这时，一条红蛇从庙里窜了出来，吐着细长的舌头，从中岛的皮靴上滑过。中岛吓得后退了几步，问黄台梯：“这里是什么地方，哪来的蛇？”黄台梯灵机一动，顺着中岛的话往下说：“这里是白马王庙，蛇出现是白马王让你们放人呀！上个月皇军在海坛岛就因为霍乱死了不少人呢！”中岛听了这一番话，倒吸了一口气，瞪了黄台梯一眼，手一挥，灰溜溜地率队撤退了。乡亲们私下议论说，台梯跟他的父亲一样，不是普通人。

可是没过多久，鬼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在象园乡抓了几十个乡民，关在雁塔庙里，吵着嚷着要花姑娘，否则就要将他们全部杀头。黄台梯听说后，立即赶到雁塔庙。只见几十个农民被五花大绑，跪在烈日下，有几个已经昏厥过去，还有一个左手的五指都被砍断，鲜血直流。黄台梯用日语质问村野少佐：“此人哪里得罪皇军了？”村野说：“我让他交出花姑娘，跟他说了半天，他都不懂我的意思，还对我指指点点。”黄台梯笑道：“皇军息怒。这些人都是农民，只会讲福州话，你说日语，不是对牛弹琴吗？再说你们整天就知道花姑娘，花姑娘都被你们吓跑了，都逃到闽

北山区去了。你就算杀了他们，他们也交不出来啊。”村野问：“闽北？怎么走？”黄台梯说：“离这远着呢，你们现在小跑着去，也许还能追得上那些花姑娘。那里还有中国军队等着你们呢。”村野上下打量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问道：“你就是黄台梯？”黄台梯说：“正是在下。”村野早就听说黄台梯的大名，今日领教了他的厉害，只得命人释放了那些百姓。

福州民间流传的关于黄台梯智斗日寇、勇救乡亲的故事还有很多。人们发现黄台梯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赶到，用几句鸟语就赶走了鬼子，都视他为救星。但也有人心存疑惑，鬼子为什么肯听他的话放人，黄台梯是哪来的胆量敢与日本人正面交锋？黄台梯说：“乡亲们救过我父亲的命，我保护乡亲们，是报恩。日本人杀害了我的父亲，我对付日本人，是报仇。有恩必还，有仇必报。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斗赢鬼子，是父亲在天之灵，助我一臂之力。”

1977年，黄台梯病危，弥留之际嘱咐子女将其埋在金狮山父亲黄三梯的墓旁。他的子女都很有出息，也很孝顺，常常上山凭吊祖父和父亲，他们的坟前还不时有陌生人送来鲜花。而距离他们不远的江氏墓园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墓碑不知被谁砸断，围墙只剩下墙基，墓亭里堆放着杂物。时过境迁，金狮山渐渐被人遗忘，“弹指一挥间，已是匆匆数年，多少恩怨，已成过往云烟。”所有传奇的故事随着光阴的流逝终将归于平淡，江黄两家的恩恩怨怨，都已尘归尘，土归土。

陈衍、何振岱结怨之谜

游友基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人。创作大量诗歌，出版《石遗室诗集》，钱基博称之为“并世文章之雄也”，同辈誉他“卅年主持诗坛”，乃“诗坛救主”。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又字心与，60岁后改字梅叟。闽县人。有《觉斋诗存》7卷、诗文集《我春室集》3卷。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评云：“读何梅生诗，如置身九溪十八涧间，隽永刻炼，虽无弘伟之观，无愧山泽之癯。”两人皆为“同光体”闽派代表诗人。

陈衍诗学著作《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乃近代诗论史上扛鼎之作。他提出诗“三元”说，谓“诗莫盛于三元”，即唐朝开元、元和和北宋元祐，力排“诗必盛唐”说，主张唐宋并重，实际更倾向于宋诗，提出“学人之诗”说，整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使之互补、融合。这些诗论主张独辟蹊径，影响深远。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评曰：“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自有

诗话以来所未有也。”总纂《福建通志》，并有经学、史学、小学等著作。何振岱协纂《福建通志》，总纂《西湖志》。晚年在家广收弟子，培养出福州八大才女——叶可羲、王德愔、刘衡、王真、薛念娟、张苏静、施秉庄、何曦（何振岱爱女），一说加上王闲、洪璞（守贞），为福州十大才女。

陈衍与何振岱，两人属同乡，从小皆聪颖勤学，先后中了举人，堪称才俊，但仕途坎坷，终其一生，均未正式担任过清廷和民国的官员。两人多有建树，实乃晚清近代两颗文化巨星。两人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后又失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缘于何因？

友谊深厚 山高水长

一、相见恨晚 择屋为邻

1909年秋，陈衍离京返里，路过上海，认识

了何振岱。二人虽为同邑，彼此也知悉对方的文名、诗名，却未谋面。此次会见，都十分振奋，大有相见恨晚之概。此后，陈衍逢人便称赞何振岱诗作，尤其是其十余首游福州西湖的诗。陈让何将《孤山独坐雪意甚足》题写于自己的扇上，“见者无一不极赏”其“钟定声依无际水，诗成意在欲开梅”二句。由于陈为何延誉，何在沪声名大振。当时上海报刊辟有“文苑”一栏，选登

海内名流作品，何的诗作亦常被采用。1923年，陈在沪编就《近代诗钞》，闽省入选诗人诗作，除陈宝琛、郑孝胥外，以何为最多，达128首，这显然有何扬名之意。陈对何诗，评价很高：“吾州后起能诗，无出何之右者”，谓何诗“深微淡远”，“时复浓至”，富有神理，“诗语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无艰涩之态”。陈诗对何有较大影响，二人志同道合，心有灵犀。何成为同光体闽派殿军，与陈对其帮助，不无关系。

陈衍任职武昌期间，1905年返闽，于文儒坊购屋。后又回榕在宅内修建小花园——匹园。购邻舍破屋修成直园，与匹园相连。筑诸楼，1929年全部竣工。何振岱听说陈衍的房子在文儒坊三官堂，便于1910年在其宅对面，买下一座房子。

辛亥革命后，两人都回到福州，成了邻居，往来密切。何小陈11岁，陈衍伯兄陈书之子陈敬与何为同年举人，何便依陈敬的侄儿辈分，称陈衍为三叔。陈宅的梅花将开，便邀何月夜来园赏花、饮茶、喝酒，由何弹琴助乐。有时一起赏画，有时一起出游访友，均有诗纪之。

二、偕游山水 结社吟咏

陈、何志趣相投，如均喜观瀑听水，因此偕游山水，诗词酬答，



文儒坊 鹿野/摄

便成二人交往中之常事。足迹所至，近在福州，远到无锡。1917年，他们曾到鼓山灵源洞听水斋游览。陈作诗云：“不到国师岩九年，主人长作出山泉。听泉看竹真成例，一度空斋一惘然。”1918年冬，他们同游无锡，至惠山，过寄畅园。何携夫人郑岚屏偕行。郑岚屏，名元昭，林则徐曾外孙女。1894年与何喜结连理。梅叟岚屏，伉俪情深。1942年病逝。此行三人均有诗。陈《过寄畅园》云：“泉似九溪十八涧，树高百尺两三行。石为小狍孤行好，亭有回栏一坐长。”之后，何归里，陈作诗赠别。

1913年春，陈衍回福州。7月，王允皙、何振岱发起成立诗社，推陈为社长。王允皙（1867—1929），字又点，号碧栖，长乐人，有

《碧栖诗集》行世。陈以其在京结诗社的经验，建议：遇良辰，择一胜地，饮寓斋，“分纸为即事诗”，“次集则易一地，汇缴前集诗，互相评品为笑乐。其主人轮直之”，“宜择数家有亭馆花木者”聚集。于是王又点于立秋后一日，招往城南李园沈叔眉祠堂为第一集。自此，秋社成立。第一集共10人参加。陈有《秋社吟集叙》文及《立秋后一日碧栖招集城南沈祠》诗述其事。第二集在陈衍住宅举行。陈在宅园内曾建闻雨楼，1913年5月，在居屋前凿一小池，纵横仅8尺，养金鱼数十尾，但作《小池赋》近千言，尽情咏叹小池朝夕之美景。此集以“小池”为题，陈衍作《石遗室前新凿小池诗以落之》，说小池“双圆水月一方池，三面栏于缭绕之”，诗人相聚，“老去填词



大光里8号的陈衍故居 鹿野/摄



陈衍故居内的木棉树 鹿野/摄

风皱后”，“千言赋更七言诗”。何振岱赋诗云：“旧梦街西忆绿漪，芙蓉烛底露华滋。未忘舍宅名萧寺，犹为悲秋赋小池。量水恰容双照影，戴花无复一开眉。吟魂可似床间月，来与初寒慰掩帷。”格调悲凉，所以陈衍说：“直是补作一首挽诗。”此集共赋诗 10 余首。《小池赋》及诗流传出去，沪上好事者专程前来参观，一见之下，都惊叹诗人们想象力实在太丰富！第三集在林宗泽寒碧楼，商议重修福州西湖宛在堂，陈作《寒碧楼小集谋修西湖宛在堂》诗。集会多次，公推何振岱、龚乾义（惕庵）诗最工。数月后，陈游京师，而社集照旧举行。1920 年初，说诗社成立，每月集两次，初时会员 13 人，后增至 40 人，从陈衍学诗。陈有《说诗社诗录序》叙其事。

三、里巷修志 共襄盛举

1916 年，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要重修《福建通志》，聘沈瑜庆为名誉总纂，陈衍为总纂，陈元凯为提调，何振岱等 16 人为分纂。至 1921 年岁暮，新通志基本告成。何振岱负责“列传”的纂辑（约十之七八）。

晚年失和 终成谜团

何振岱对陈衍推崇备至。他在赠陈衍的诗中说：“石遗人天眼，众妙参真源。鸿鹄志八表，焉得守乡园。”致陈衍函云：“先生之诗，非赞叹所能尽，且精绝处，诸诗老已有能言之者。……集中神奇万态，直如高山大海，无所不有，读先

生诗，始知一丘一壑，扁识自囿者，不可以为诗也。岱自知诗学芜浅，此后决未敢著笔，俟再读书数年，然后为之。”但 1928 年后，二人关系恶化。1938 年，何刻其《觉庐诗存》、编辑《榕南梦影录》，凡与陈衍有关之作，尽皆删削。《觉庐诗存》宁可无“序”，也不用陈《何心与诗叙》。晚年《我春室文集》绝不提及陈衍。痛嫉至此，出人意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从 1928 年后也无陈、何交往或何行藏的记载。有一次，何之老友吴家琮对何说：“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劝他改善对陈的态度，何正色道：“家琮先生！我何振岱是读孔孟书的人，爱憎分明，难道污，可以阿其所好吗？”（吴家琮：《故友何振岱生平事略》）

究竟何因，使陈、何交恶？郑天放在《大同日报》发文列举《西湖志》遗漏及不合体裁处，并说这错误乃因何振岱宠信其挚友叶心炯所致。何受此指责，十分愤怒。经查这是林宗泽从中“搞鬼”，因而何对林宗泽十分不满。林宗泽是陈衍说诗社弟子，与陈关系密切，叶心炯与陈关系较疏远，于是叶心炯便“一五一十函诉于何（何客居北京）。何信以为真，对陈不满实基于此。”（吴家琮：《何振岱晚年不满陈衍之由来》）

与王真有关？何晚年在家广收弟子，培养出福州八大才女，一说为福州十大才女。王真（1904—1971），字耐轩，号道真，又号道之，自署道真室主人，王寿昌女，终身未嫁，有《道真室词》。王真先拜何为师，后师从陈，随其北

上，游历名胜。她是说诗社唯一女成员，《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的续修者。何振岱与陈明（主钦）友善，曾撰《陈主钦先生行略》。何振岱庚辰（1928年）农历八月廿一日、廿八日日记：“主钦来，言耐轩（王真）讪余甚多，此女极无良心。”“至主钦家……主钦将耐轩所寄赠相片撕碎。”据后来行状，王真非主钦所言。1940年，王真在何振岱贫病时曾资助何，且与其他女弟子轮流看护何，何有《六月沾暑大病举家汹惧既愈书此记之》诗，记其事。1948年，福州洪涝，何被困文儒坊，只好坐在大洗衣盆里漂浮，王真闻讯后，即雇船将何救出，住到她家（光福山房），后又救出其家人。何家对她心存感激，何振岱还送田黄等礼物给王真。据此，王真挑唆何振岱与陈衍关系，似无可能。

陈衍与何振岱人格高尚，素有气节，都是正直、执着、恪守道德之人。陈衍1895年赴京应试，由他起草，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1911年，他对辛亥革命表示支持。1915年，“筹安会”策划签名上表袁世凯“劝进”，他被列名“劝进”的“硕学通儒”名单之首。他获悉后，大怒，坚决反对，要求众议院撤销自己的名字。1932年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部长，陈衍愤慨之余，与郑绝交，并通知商务印书馆将1923年他所编的《近代诗钞》中所收郑孝胥诗作，予以删除，表现出正确的原则立场。

何振岱于林旭被害后作《晚翠轩集附录》，

对林旭表示敬佩与悼念。辛亥革命后，回到福州里居。对于这场不彻底革命之后的社会黑暗，有所批判。其《春感》四首写于1916年前后，借落花写时事。国土破碎，列强欺凌，国事日非，而新老权贵依然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希望雷霆来打开隐藏的心扉，倾诉内心的隐痛。这个平日沉醉于诗与梅的诗人，露出了他那“峥嵘”的一面。何振岱获悉郑孝胥等人附逆，则将过去来往诗文、书信“全部摧毁”，并与之绝交。福州二度沦陷，何贫病交加，日本人欲聘他为顾问，他严词拒绝。后省政府上报褒奖他富有民族气节，他又婉言谢绝。蒋介石60寿辰，他不替省主席代作贺寿文章。他与陈衍友善时，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看出他凡事坚持原则。

两人晚年失和，绝不会是无原则的纷争或私利纠缠。从现有史料看，是何振岱首先主动与陈衍绝交的，他认为陈衍品德上有问题，他不能与之同流合污。估计与修纂《福建通志》《西湖志》有关。可能两人之间有所误会。

何择友谨慎，有《交友》《知己说》等文论述交友之原则。何视陈宝琛为深交知己，但对陈在谢章铤去世后占有谢藏书（多孤本、善本），谢后嗣孤寒也不赍恤，言辞却颇多不满。陈宝琛之子陈几士与何交情亦深，几士常求何作文及题跋，何无不答应，但过了数年，因故与陈几士断绝往来。可见何择友十分严格。他与陈衍的失和，或许是其思想、性格使然？原因何在，迄无答案，或将成为历史谜团。

吃在福州

宋祝平

聚“形”凝“神”说小吃

几十年前初到福州，便觉得福州的地方小吃很新鲜很独特，虽不好说全国独一，称之为国内罕有却是当之无愧的。像锅边、鱼丸、肉燕、蛎饼、芋泥什么的，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那时口袋里没有钱，又生性好奇嗜吃，下馆子办不到，便只好去吃小吃。吉祥山的依幼鱼丸，817北路味和馆的芋泥，还有一条小巷里的阿焕鸭面，味道都好极了，令我至今难忘。有时下乡采风，肚子饿了，便去路边买个油锅里刚炸出的蛎饼用光饼夹上充饥，也吃得有滋有味。小吃来自民间，扎根乡土，福州几样风味独特令人倾倒的小吃，倒是很能代表福州的“一方乡土一方人”了。

今日福州的地方风味小吃，“名”还在，许多品种都保留着，失传和绝灭的若有也仅一二种，但“形”与“神”似乎散了不少。就以锅边来说，这种用米浆做出的小吃，我在别处还未见过。本来，做锅边，要用猪骨、蛭子、蚬子、虾

米熬汤，再佐以香菇、金针菜、木耳、竹、肉丝、猪大肠、虾米、蚬肉、芹菜、青葱，称之为十锦锅边，香滑适口，十分有味。现在往往是锅里清水一瓢，佐料随便什么丢到锅里便是。虽然也叫锅边，价钱也便宜，实际不过是带咸味的米浆糊而已。其他如鱼丸、蛎饼等小吃，也常有这等粗制滥造的现象。

我不主张地方小吃高档化，像锅边也加上什么海参、鱿鱼、干贝为佐料，似乎名贵，实为弄巧成拙，反失其地方民间特味。何况如今上街就



餐者越来越众，也需照顾到大众消费水平，如小吃价码高得令人生畏，也失其“民间”本色。不过，因“粗”“滥”而使小吃失其独特的个性，也不可取，倒是“精纯”，再加“大众化”为佳。像从前的依幼鱼丸，名声很大，那只是因其鱼丸和薯粉选用得当，比例合理，肉馅鲜美，又用了鸭汤而已。还有阿焕鸭面，那面条也很普通，只是鸭肉鲜嫩，也用鸭汤，他们便都以货真价平闯出了招牌，吸引了食客，又获利甚丰。因此，我觉得，要使福州的小吃振作起来，今更胜昔，只需业者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于技法用料上认真一些就可以了。自然，如能调整一下那个“一宴万儿八千，小吃辛苦半年”重大轻小的观念，并且还需有人抓它一下，推波助澜，给以关心引导，树几个真正的名牌小吃做“带头羊”，推而广之，又何愁福州小吃不能刹住颓势，重展昔日光彩呢？

最后再说两句：今日要品尝像样的福州风味小吃，也不是无处可觅。有些锅边、鱼丸、肉燕小店，还有点水准。只是也还需加把力，再上一层楼罢了。

福清“三饼”乡情浓

说福州之“吃”，便不该局限于福州市区一隅，按理应包括福州地区或福州语系好大一片地方的。尽管，福州城里汇集了“吃”之精萃，“乡下”跟城里没法子比，但“乡下”之吃，却也各

有不可替代的风味与乡情。

先说距福州 60 公里的福清市，便有鱼饼、光饼、蛎饼，虽说这“三饼”都是些土生土长平民百姓吃的小吃，却又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吃，别有滋味，乡土情浓。

曾有一年春节前，福清市饮食公司陈经理到福州来，问我有没有吃过福清的鱼饼。这事挺新鲜，我答别说说吃，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便大为兴奋，对我把鱼饼大侃一通，说这鱼饼属福清独有，在别处是吃不着的。又说最有名的算犬佛姆鱼饼，还写入了福清县志。而创出这名吃的犬佛姆，那时年已古稀，仍然健在。

我听着也很来劲，当然要跑到福清见识一番了。

在福清拜访犬佛姆时方知，犬佛姆其实是小名，老人的大名叫王长财，当年七十有七，虽坐在家中纳福，身子骨却十分硬朗，不见什么老态。他说，他从 12 岁开始做鱼饼，已做了五六十一年，从前鱼饼是实心的，到他手上才加上了鲜肉馅。如今在福清，无馅的反而不能称为鱼饼了。

老人极有兴致，一下子便把我们带到由他徒弟主理的融霞饮食店，要亲手做一回如假包换以他的大号命名的鱼饼让我尝新。这鱼饼的外形和制法跟鱼丸没有什么两样，我弄不懂为何是“丸”，却叫“鱼饼”，只好入乡随俗。不过，这鱼饼跟鱼丸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鱼丸用成泥的鱼肉掺茄粉，鱼饼拌的却是上等面粉，且加了姜末、葱花、味精、食盐、荸荠丁、鸭蛋，讲究的

还加蟹黄，外皮便显得色彩缤纷；其次，做好的鱼丸都是放入清水中再煮，鱼饼却是放入微热的油锅用温火炸熟的，外观仍为原色；其三，鱼



丸都

是做汤，而

鱼饼炸熟便可装盘上桌了。

我尝这鱼饼，果然别有风味，还未入口，便已香味扑鼻，令人食欲大动，放入口中，滑嫩细腻，极有咬头。这样一盘鱼饼所费一般不过10元左右，可谓物美价廉。

融霞饮食店地处僻街，设施极其简陋，跟我们平时所见的小饮食店没有什么两样。但那店主却颇为自得，说：“好多人，包括一些海外知名人士，像印尼林氏家族的亲人，都慕犬俚姆鱼饼之名，特地寻到这家小店，有些旅居香港的乡亲，吃完了还要带一包回香港去。曾有家饮食店见到一伙福州人在街上找犬俚姆鱼饼吃，那个老板居然冒名顶替，说‘我这里就是’。”说完大笑。融



霞饮食店共有十五六张大餐桌，我是午前进店，还不到午餐时分，便已座无虚席，许多后来者只好向隅，生意如此红火，足见他说的不假了。

福清的另外两饼：光饼和蛎饼，可称福清街头路边的一大景观，卖光饼和炸蛎饼的随处可见。福清光饼大小如杯口，上有芝麻，略带咸味，吃起来特别有味。当中有眼，用麻绳穿成一串又便于携带，相传是明朝戚继光打倭寇时士兵们做干粮的，所以称“光饼”。不过在福州市区却叫“福清饼”，足见其为福清特产。其烘烤方法也很特别，与福州不同。烘炉为一外裹黄泥直，1米多的大缸，先用松柴点起冲天大火把内壁烤白，然后由一人递饼，一人接饼贴于内壁，动作敏捷，配合默契，“噼噼啪啪”，节奏感十分强烈，令我大开眼界。然后用木柴烧成的炭火慢慢烘熟，这样烘出的光饼便特别香脆。每次出差路过福清，我都要趁停车时买上两串，自认这是最好的点心，而别人见我吃得津津有味竟忍不住向我讨光饼吃。这光饼还可夹上粉蒸肉、苔菜、雪里红等，虽说是平民小吃，但因其风味独特，如今连宴席上也拿来出一道很受欢迎的点心。至于用黄豆大米磨浆放入油中炸出的蛎饼，倒跟福州其他地方蛎饼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福清靠海，盛产海蛎，蛎饼中

所放的海蛎特多特鲜罢了。

福清的“三饼”，并非什么名贵之吃，但因其来自民间，取材本土，又融入历史，乡土味特浓，所以，其最可贵处，便是乡情。

吃“海”何不下连江

濒临东海傍依闽江的连江，并非什么大去处，有什么东西好吃？

连江县的朋友笑答：“靠海吃海。”

吃“海”，最有名的莫过于连江的鱼面和鱼丸了。当年县里唯一的特三级厨师孙开钺师傅做的炒鱼面，便曾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烹饪大赛中得过奖。加工鱼面，跟福州做燕皮的方法差不多，都用茹粉。只是燕皮用瘦猪肉，鱼面用鲜鱼肉。从前黄瓜鱼极便宜，肉质又细嫩洁白，加工鱼面便都用黄瓜鱼。现在黄瓜鱼很贵，吃不起，便改用春仔（小黄鱼）等别的鱼，同样也很好

吃。如今鱼面虽可机制，但以手工擀出来的鱼面为好，那面条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韭芽、青葱、瘦肉丝、鱿鱼丝、香菇丝炒出来的鱼面，面条洁白清爽滑嫩可口，配料色彩醒目刺激食欲，确是一道美食，在别处是吃不着的。

连江鱼丸已走向全国，当年第一个把鱼丸打进上海闯出名号让外省人认识鱼丸又赚了大钱的，便是连江人。尔后，北京、青岛乃至内地也都有了连江人开的鱼丸店。湖南人不喜茹粉，又无海鱼，连江人入乡随俗，便用面粉、淡水鱼做鱼丸，同样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要说连江鱼丸到底好在何处，连江的朋友用本地话说：“有人问海龙王，什么东西最好吃？海龙王答，鲜！”连江濒海盛产海鱼，就近取材，便占了一个“鲜”字，再加制作精细，选料讲究，鱼丸还有不好吃的吗？

到连江吃海，当然不仅限于鱼面、鱼丸两



样。近海捕来的红鲟，海涂上养的蚶、蛤、竹蛏、海蛎等等，讨小海得来的银鱼、跳跳鱼以及我叫不出学名、福州也难得一见的什么车蛎（一



种长七八厘米、形似蚯蚓却又色白的软体动物)、海云（一种直径两三厘米、成红色的球形软体动物）、笔架（一种形似笔架的贝类）等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餐桌上的美食。一道红鲟桂圆汤，鲟肉便更“甜”（这是福州人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一个词），那汤喝下去也极美味、极提神开胃。还有连江老酒炖跳跳鱼，鱼肉也特细软鲜美。我叫好，朋友便提醒我仔细看一看鱼身，原来这跳跳鱼身上有些星星点点的银绿色斑点。朋友这才笑说：“无斑的跳跳鱼是‘假’的，口味比这真的差远了。”福州同来的朋友插话：“怪不得，原来我们在福州吃的跳跳鱼，多半是假货。”至于

我吃到的其他样海产，比如炒车蛎，也很鲜嫩。我便揣度，连江地处闽江入海口，可能是江水带来的众多浮游生物养肥了这些海里的动物，连江海产才这么鲜嫩。如此说来，连江也可谓得天独厚了。

午饭在连江大酒家吃，一桌大约十道菜，全是鲜活海产。正因有这个“海”的特色，便可与福州的一些大酒家一争短长。连江距福州仅50余公里，交通还算方便，如有暇或公干，何不就近吃一回“海”？

闽清糟菜有文章

我要去山城闽清，看看那里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介绍给公众。几位朋友听了摇头，说：“恐怕你会失望。”

其实，“天下何处无芳草？”闽清的糟菜，虽极普通，为平民百姓的家常菜，但在福州地区乃至东南亚福州籍的华人圈里，却享有盛名。有了这一味糟菜，便做出许多“吃”的文章。

糟菜许多地方都产，不止闽清一地，何以闽清的糟菜得以扬名？这便赖于梅城镇西五里的洋头村了。这村子处于梅溪岸边的冲积带，水好土好，加上背倚大山，芥菜田每日只半天日照，种出的芥菜便特肥特“甘”。取这样的芥菜晒至半干，拌上红酒糟和食盐，放入瓮中腌三五个月，方成糟菜，除了带甘酸的鲜味，还伴有一股淡淡的酒香，这特色是别处产的糟菜所不及的。

糟菜在闽清还有一种吃法，叫“糟菜灶上排”。其烹调的方法极为简便，只不过是以前糟菜垫底，压上上排“灶”（这个词大概是福州人专有的，字典上查不出来，其意，不过是炖、煮时汤水较多而已）它一遍就可。但所用糟菜不可切碎，而是取茎切成约3厘米大小的薄方块，汤味酸甜不腻，肉味也更显香醇。20世纪80年代中期，胡耀邦同志来福建视察，看过闽清下溪水电站之后，在闽清县城就餐，便尝过一回闽清人做的“糟菜灶上排”，吃得很满意，称赞味道很好。看来，糟菜这个平民百姓菜很得人缘。

事实也是如此。过去被视为“土”“贱”的糟菜，今天的酒宴上也作为一碟菜来奉客了。据我所见，这一碟糟菜常常是最先被吃光的。除了它清纯爽口开胃，糟菜的乡土味也是讨人喜欢的原因之一，海外福州籍的华人钟爱糟菜，便说明它带有浓浓的乡情。

半山区的闽清既有梅溪，又傍闽江。虽然不产海鲜，但产河鲜。江河里捕捞的梅鱼、黄甲

鱼，肉质可用细嫩甜美四字概括。因是天然的，数量极少，在市场上也是难以得见的。取一点糟菜碎丁同鱼清蒸，做糟菜梅鱼或糟菜黄甲鱼，便成一道极具特色的佳肴。糟菜掩去鱼腥，汤味甘酸开胃，别有一番风味，我还少见溪鱼有这种吃法。

闽清塔庄的茶口粉干，也是极有名的特产。闽清人说，享有盛誉的闽侯桐口粉干，便是从茶口粉干衍化而来，不知是否如此。不过，茶口粉干确有自己的特色，线条较桐口粉干略细，也比桐口粉干韧性好有嚼头，而最大的特色我认为是它“吃味”，不似别处的粉干口感那么寡淡。糟菜泥鳅煮茶口粉干，是闽清人的家常便饭，尤其在中秋节，是家家餐桌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为何如此，有什么历史故事，我便知道了。我是不大喜欢吃粉干的人，那次在闽清却吃了不少，就像我这个北方人吃面条那般的喜欢，足见闽清糟菜和茶口粉干的魅力。

本文本该就此打住了。不过，闽清还有一道“三鲜丸”值得一说。“三鲜丸”取豆腐、瘦猪肉，加虾仁或鸡肉成三鲜，剁碎成丸，蒸熟后加高汤、金针菇、香菇、肉丝便成。这一道菜虽然也是闽清人餐桌上的家常菜，普及得很，但我在福州地区，无论居家或餐馆都少见少吃。以豆腐为主料，这道菜也颇具乡土味，同时口味清淡，又大有回归自然的情趣，喜欢的人不妨自己试着做它一回，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谁解人间烟火味

——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烹饪教科书》

陈逸



陈衍



陈衍著《烹饪教科书》底本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晚称石遗老人，福州人。早年幕游各地，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他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朴学、史学、经济学等造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留有大量诗文经史著作，所揭橥的“同光体”诗论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

民国首刊《烹饪教科书》

1915年，农历乙卯年，也是民国四年这一年，陈衍60岁。对于一位早已申明“吾自入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的学者、诗人，他的收获是满满的。他受聘兼任北京法政学校文

字学讲席；与樊增祥等 10 人，在顶银胡同成立春社作诗；应李宣龚之约，续作《石遗室诗话》18 卷，登载在《东方杂志》；年底时，还直拒袁世凯的筹安会劝进丑剧“邀请”，留下了“以德高独尊”的美名。当然，这一年里，还有一件事，让陈衍感到十分惬意，那就是他的《烹饪教科书》的出版。

出版《烹饪教科书》的重要背景在于民国初年的教材编写制度。1912 年 9 月，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规定“初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这是我国首次实行教材的审定制度。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经理李拔可都是福州人，与陈衍是老乡。他们熟知陈衍既精于诗，也精于庖，就请陈衍撰写。陈衍心中有数，将自撰的《石遗室食谱》改写为《烹饪讲义》，全书 3 万余字。此书经审定后，更名为《烹饪教科书》。民国期间，坊间流传着多种私家菜谱，仅商务印书馆就出版有《陶母烹饪法》《俞氏空中烹饪》《英华烹饪学全书》《家事实习宝典》《家政万宝全书》以及《实用饮食学》等，唯有陈衍的《烹饪教科书》署有“教育部审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烹饪教科书。

陈衍在书中写道：“本书之著，实为创作，非如他种教科书，有东西书籍可作依据，虽不敢自诩为空前杰构，而经营惨淡，煞费苦心，阅者鉴之。”他将《烹饪教科书》分作“前编”与

“后编”。“前编”的“总论”由“绪言”“饭菜论（上）”“饭菜论（下）”“荤菜论”“素菜论”“锅灶及诸燃料”“刀砧及诸杂器”“盘碗”“作料”及“食品不能分时令”10 篇组成；“后编”分各论，具体为 70 道菜式（另附 56 道菜式，合计 126 道菜式）做法，虽广涉猪、羊、鸡、鸭、鱼、虾及各类蔬菜，但也都是日常家居菜品。书中还汇聚了“烧、煮、炒、川、蒸、炸、卤、会、炖、溜、爆”等烹饪技法。

陈衍认为，饮食之道，古人所重，如调理得当，以有限的钱获得最大营养，对养生奉老甚为有益。他倡导“居家节俭”，列举了教子有方的孟母、饮食精办的李络秀、善煮鱼羹的宋五嫂的故事与话语，说明烹饪“精而有法，用钱省而可食；反是，用钱虽多无益也”。

1948 年，国民政府再次颁布了《专科学校法》之后，商务印书馆将《烹饪教科书》改名《烹饪法》，再度报审，获职业教科书委员会审查通过。此书先后于 1915 年、1916 年、1935 年和 1948 年四次印刷出版，可见需求之大、影响之广。

诗酒花光阁

陈衍 1856 年农历四月初八生于福州市城东北井楼门内龙山之麓。他的先祖陈奇珍“以军官征台湾，战歿，捡骨归葬东关外金鸡山，世袭云骑尉”，传到祖父、父亲，“皆积学未仕”，靠设

馆授徒为生。正因为自小家中并不富裕，他勤于治家，熟悉家务，尤其练就了一手烹饪技艺。后来，陈衍赴台湾入刘铭传制下幕府，在上海任《求是报》主笔，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再后来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居苏州。这样的走南闯北的人生历程，让陈衍遍晓南北各地民间风俗与菜肴制作。他也以“君子不必远庖厨”自况，在诗友聚会中，常亲自下厨作膳奉客。

1907年，陈衍携眷到北京，就任清廷学部主事之职，住在宣武门外上斜街小秀野草堂。这里原是康熙年间诗人顾嗣立的旧居。沈瑜庆、陈宝琛、林绍年、张亨嘉、严复、林纾等福州老乡，常来这里与陈衍谈叙乡情，讨论诗文。其他在京



小秀野草堂

的赵熙、吴士鑑、江翰、胡思敬、曾习经、杨增莘、罗惇齋、温肃、林思进、胡琳章等，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成立诗社，并常在此诗酒相会。林纾每次都要绘一幅画，挂在厅堂助兴。陈衍下厨置办酒菜，菜也平常，只不过煮燕丸、炒米粉、溜黄菜、猪油蒸芋泥等家常菜，但做得很精美，大受众人夸奖，从此陈家菜就此传扬开。

北洋大臣托忒克·端方任湖北巡抚时就熟识陈衍，听说过他的厨艺，此时他也在京任职，便借机让陈衍请客。陈衍推辞不过，只好应承下来。端方一面吃着陈衍做的菜，一面评某道菜比北京最有名的福全馆（满汉酒席菜馆）还好，某道菜则不如。

1916年，陈衍应邀回闽主持编纂《福建通志》。在“三坊七巷”大光里家中的匹园花光阁，顿时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诗楼。陈衍组织成立说诗社，入社弟子达数十人，常聚集他家中吟诗作赋。章炳麟的女婿朱镜宙曾在诗中称道：“吾爱陈夫子，诗盟主建安。”陈衍每年人日（元月初七）、春尽日，在家设宴招饮友人与弟子。诗人林翰（福建省议议院长）曾作《春尽日饮匹园归赋》诗云：“江城一角远尘喧，小筑楼台有此园。白酒与春期后约，乌山俯座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野意存。颇喜今年尘累少，屡陪籍漉到韩门。”福建省主席陈仪来访，陈衍也在家招待。陈仪盛赞陈家菜较北京谭家菜（清末官僚谭宗浚的家传筵席）有过之而无不及。

钱锺书亦对陈衍学识与为人推崇备至，曾写

《论诗友诗绝句》称颂陈衍，云：“诗中疏凿别清浑，瘦硬通神骨可扪。其雨及时风肆好，匹园广大接随园。”诗中的匹园是陈衍的诗楼，随园是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住所。袁枚所著的《随园食单》，是清代一部系统论述汉族饮食的重要著作。钱锺书把陈衍比作清代的袁枚，赞誉袁陈二人在诗学上的造诣，或许还有褒扬他们在烹饪饮食上创意独到之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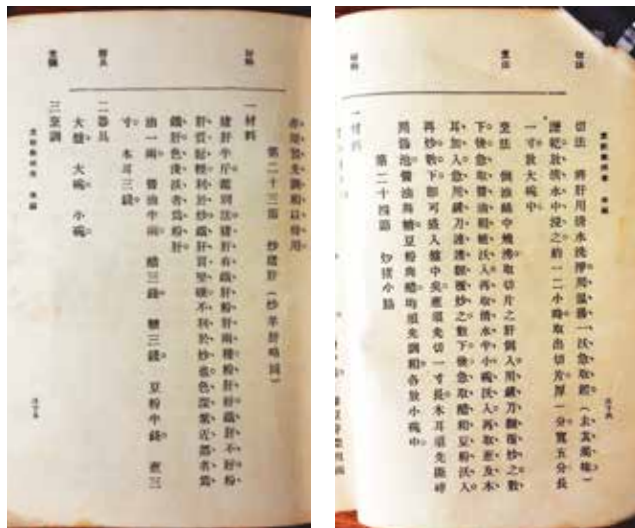
陈衍之妻为晚清才女萧道管。陈衍曾对钱锺书说：“若余先室人之兼容德才，则譬如买彩票，暗中摸索，必有一头奖。”萧道管能诗会词，著有《说文重文管见》《列女传集解》《然脂新话》《平安室杂记》《萧闲堂杂记》等。她过世后，陈衍曾作长诗《萧闲堂三百韵》（3000字）哭之，中有：“……肝疑书客呕，心似乐工刈。……白头君不赋，黄土我如飴。萧闲堂万古，留恨绕须弥”等句。数年后，陈三立之子陈衡恪（字师曾）留学日本归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教授，特为陈衍画《萧闲堂著书图》，并刻《萧闲堂》印章一枚，题诗云：“阅尽人间世，独有萧闲堂。至情深刻骨，万事莫与偿。山含夕阳古，叶落空阶凉。抱此垂垂老，哀歌天地荒。”因萧道管自号萧闲堂主人，夫妻感情至笃，《烹饪教科书》以“萧闲叟”署名，是陈衍怀念爱妻之举。

复活“老味道”

我作为陈衍的玄孙女，坐于桌前翻开高祖父的《烹饪教科书》。高祖父于开篇写道：“烹饪以家常日用之饭菜为主，不宜罗列珍羞，流于奢侈。本书编纂，一依此旨趣。”故，书中记载的老味道应是我们老百姓家常的味道。当岁月在指间流转过百年，这百年前的滋味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模糊忘却，我们是否可以让味蕾忆起那段已经寂然的光阴呢？于是，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升腾：我要寻回书里的“老味道”，让100多年前文人菜的“老味道”复活！将每一道菜式的复活，原原本本地呈现给所有人，正如这本百年教科书，让它继续自身的使命。

于是，我开启了寻味百年之旅……

温沃冷淋舒郁气，急翻快覆炒珍滋。平生只愿情如意，莫让襟怀滞妄痴。复活第一道菜式——“炒猪肝”。在我们闽菜中有道名菜——南煎肝。南煎肝经传统技法烹制后的口感是鲜嫩



《烹饪教科书》中的“炒猪肝”菜式



炒猪肝配料



炒猪肝

松嫩。这种自然之法替代了南煎肝中生粉的功效，不仅口感上可分庭抗礼，而且

的，这除了得益于烹制过程中厨师对火候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事前必须将猪肝裹上生粉，以保持其水分不过度流失。而《烹饪教科书》中的这道“炒猪肝”，却是不包裹生粉，完全是生炒烹制。

按照《烹饪教科书》记载之法，不到一分钟，一盘生炒猪肝在扬手起落间，走过了百年。它的色泽温润透亮，每片约二指宽，薄如羽翼，用筷子夹起一片，它竟能轻盈、柔软地在你的箸间舞蹈。第一时间放入口中，清香萦绕，传递着时间的味道。这时只需轻咬，甚至用舌尖顶触，猪肝独有的醇香就能分解绽放于口中。难得的是，当你品过这道菜后，嘴里不油腻不胶着，清清爽爽，这也与文人雅士所推崇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相一致，洒脱、干净，不滞留、不黏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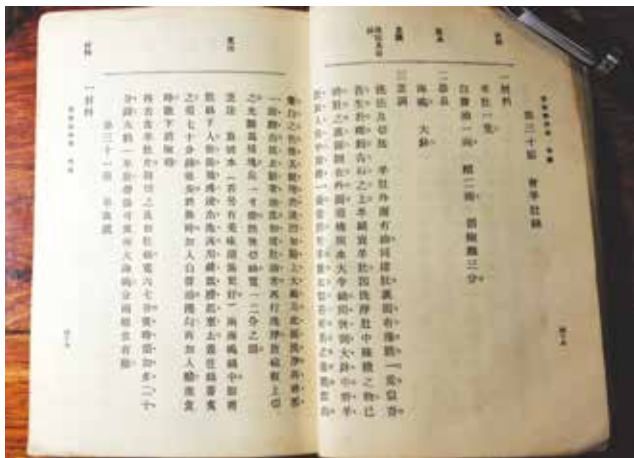
这道菜有两个难得之处：其一，据菜谱中记载，将猪肝用温水冲洗去其污秽，再用冷水浸泡。用温水冲洗，既能洁净污秽，又不影响肉质。用冷水浸泡能打开其内里，使肉质更加

食不滞口，为君子之菜，更胜南煎肝一筹。其二，生炒的技法于猪肝烹饪甚是罕见的。对温度、时间、节奏的掌握都不能差之分毫，一点的迟疑，口感便会失之千里。这是极考验厨师功底的一道菜。从菜品烹炒、装盘、上桌到品食结束都有严格的时间把控。

说到底，我们复原的不仅仅是百年前的味道，更是复原了百年前先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讲究、一种情怀与乐趣。

从复原后的第一道菜式“炒猪肝”，我明白了一件事。复原后的民国菜式不仅蕴含着时光流转的老味道，而且它们以清雅的口感慰藉、复苏着现代人已经被钝化的味蕾。

米醋胡椒白酱油，清汤羊肚若丝游。腌臢弃去方明洁，纵是麻容也玉钩。“羊肚”在现在流行的闽菜中的做法一般是蛭干羊肚煲，以蛭干之鲜味压制羊肚之膻气。而香菜爆羊肚是老北京的做法，取辣椒、香菜与麻酱的香味覆盖羊肚的膻气。这南北两种烹饪手法有个共同之处，都是借



《烹饪教科书》中的“会羊肚丝”菜式

用不同食材来对抗羊肚的膻。这是种针锋相对的刚性冲击，使用了叠加式的烹饪手法，虽有效，却不免委屈了羊肚。

清朝的老饕客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曾写道：“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

那么高祖父是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呢？

高祖父在他的诗论《何心与诗叙》中说：“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已所得……”这是他一贯的写诗为人风格，因此他在烹制美食上的态度循的也是自然之法，无为而无不为，怡然自得。延伸至羊肚的烹制，他没有利用其他食材来对抗，压制羊肚的膻，而是仅仅使用了白酱油、白米醋、白胡椒面这“三白”，先以武火烧沸，后施以文火轻炖之法，将熟时，加入“三白”，轻轻柔柔地化解了羊膻。

我想，若一道菜不仅能单纯地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且能从中蕴含菜主人的性情品格、生活趣味，那么这道菜便有了自己的“魂”，哪怕光阴

荏苒，静默的岁月长河里它的身影也永远不会消逝……

苍生永毓食为天，受飧珍羞惟恪虔。
四季烹调精有法，三餐饭菜朴宜鲜。
酸甜苦辣尘寰乐，古往今来世态怜。
谁解人间烟火味，乡愁吟咀复年年。

今天，我续写着 100 年前高祖父的《烹饪教科书》，复原着书上的菜式。谁能想到这一道道菜肴竟串起了百年的时光？我透过笔墨，似乎看见了高祖父颌首一笑，或许是因为血脉相连，或许是因为历经流转永不消逝的传承……



会羊肚丝配料



会羊肚丝

一座有温度的岛屿

何 强

《山海经》说“闽在海中”。琅岐岛的白云山、九龙山在几千年前，与昙石山一起，都是泱泱闽国的组成部分。宋梁克家在《三山志》中记载，当时的琅岐在晋安东海畔里，名“王晡山（海中）”。唐末五代初，闽王王审知为进一步

发展经济，决定开辟甘棠港，修造海船、交换货物，招徕海外商贾，以通有无。因闽江入海口怪石耸立，堵江塞海，惊涛骇浪“覆舟害物”，于是，他派得力部将刘山甫到闽江口王埔渡（今琅岐凤窝渡），“碎巨石”，“移其艰险”，甘棠港



凤窝翁氏宗祠



凤山朱氏宗祠



凤窝村的两口宋井

也就“化安流于碧海”了。刘山甫也成了琅岐岛的最早开发者之一，因其功劳之大，岛也就有了“刘岐”（也写作“刘琦”）之称。之后，福清籍御史大夫翁承赞因厌倦朝廷的“难于为治”，也羡慕家乡在闽王治理下的安宁与发展，60岁就辞官回到故里，并成了闽王的宰辅。他的孙子翁欧也许是出于对甘棠港刘岐岛发展的憧憬，携着全家，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4），从福州康山里迁徙到了海畔里王埔山（今琅岐凤窝村），翁氏也成了琅岐岛有族谱记载的最早居民之一。

琅岐岛作为福州甘棠港故里，在宋代就开始发展并逐渐繁荣。现在凤窝村，还留有两口偌大的宋井，让人充分想象到当年这里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朱氏祠堂里展示了一幅画于明万历年间的王埔渡及琅岐岛全图，图中可见，当时的凤窝屋舍林立，闽江口两岸船帆片片，巡检司城楼上

旌旗迎风招展。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秋，著名诗人陆游任福州决掾曹（掌刑狱）时，有一天，乘舟到闽江口琅岐岛旅游，写下《航海》一诗，把闽江口琅岐岛比喻成蓬莱：

羈游那复恨，奇观有南溟。
浪蹴半空白，天浮无限春。
吐吞交日月，预洞战雷霆。
醉后吹横笛，鱼龙亦出听。
流落何足道，豪气荡心胸。
歌聚海动色，诗成天改容。
行关跨鹏背，弥世蓬莱宫。

到了元代，琅岐岛原有的“海畔里”这个地理概念的称谓，被改成了寓意美好的“嘉登里”，琅岐岛也因此被叫作嘉登岛。



琅岐南山禅寺

元至治元年（1321），嘉登岛上建起了凤窝南山普陀寺；至正五年（1329），王埔江头道（码头渡口）得到重砌，被称为官道；到了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江夏侯在福建沿海建烽火台以防倭寇，琅岐岛上便有了烟台山烽火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琅岐港等地伺风开洋。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兵在闽江口琅岐岛抗倭；清代时的嘉登岛，更是尽显风流——让人悲愤的马江海战，也只有闽江口两岸的烟台与长门的交叉炮火声中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琅岐岛面积不大，人不多，但名人辈出。宋至清，走出了几十位进士举人，有的在历史上还可圈可点，如王祖道、林存、陈文肃、董养河、

翁敬棠等。吴庄村人王祖道，是岛上的第一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他分别在宋元祐三年（1088）、崇宁二年（1103）两度出任福州太守。他在福州台江建造的浮桥，至今为人们所念叨；他在家乡修建的王厝前文殊院，是一处难得的文化标志，遗迹尚存……

“唐辟海陬，宋稠芦宇，明振宦绩，清扬科名”，这是清代里人为琅岐朱子祠撰写的长联里的一句，它是对千年琅岐历史人文的简洁而形象的概括。今天，你走进琅岐，如果拉长耳朵，一定还能听到不少关于琅岐的千年故事呢。

与许多福建人一样，琅岐人绝大多数是典型的“河洛郎”，许多祖先也是来自中原河南固始

县，中原文化的印记至今刻在琅岐人的心里——敬宗穆祖，耕读传家。这一点，从琅岐人喜欢在自己姓氏祠堂前高高挂起的堂号里就可见一斑……

琅岐人还有勇于开拓、敢于并善于漂洋过海的一面。琅岐人向外讨生活，最初是因为“地多海咸，时遭岁欠”，之后，慢慢成了琅岐人的擅长之道。祖先的这种海洋文化性格一直被继承了下来，琅岐人继续义无反顾地漂洋过海，走向五洲四海。今天，琅岐镇在册人口7万左右，而在海外的多达三四万人。一个新的侨乡，已屹立在

了闽江口。祖籍琅岐的海外华人华侨，在追求个体幸福的同时，给家乡也带来了富裕；同时，在海外，他们也在维护祖国统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等很多重要活动中，发出了声音，展现了风采。

琅岐人这种心系祖国、情怀桑梓的中原文化与面向世界、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的交融，也集中体现在了今天岛上众多的姓氏祠堂里。

祠堂，又称家庙，是汉民族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宗族文化的象征。宗祠体现了宗法制中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忠、孝、廉、节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作为本地民系结构的集中表现，岛上现存的不同姓氏和不同家族的宗祠建筑数量之多，如按镇村面积和人口计算，是其他地方少见的。而且，这些祠堂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中规中矩，精致庄严，不少还被列入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祠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千年琅岐岛的富足面貌。

走进琅岐祠堂你会发现，坚韧、拼搏、共存、互助的琅岐精神，如同千年甘棠港的遗韵一样，依然在琅岐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专家认为，这些明清宗祠，除了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乡愁外，还蕴藏着许多文化层面的价值。

琅岐祠堂是福州明清时期同类建筑研究的重要范本。琅岐宗祠建筑群，虽多有重修，但一直保持明清建筑原貌。这些建筑，均为硬山顶构造，运用穿斗抬梁结构，大都由大门、照壁、藻井、拜亭及正厅等构成，根据进深不同带有数量



凤窝尚书亭

不一的天井，另有牌匾、官阶牌等文物。神龛内供奉有大量牌位，呈现出“万代如见”的情形。

琅岐祠堂也是福州乃至福建民系迁徙路线的重要参考。不管是西晋衣冠南渡，还是王审知入闽，福州都扮演着入闽第一站的角色；其后，这些最初定居福州的氏族，进一步往莆仙、闽南乃至广东、台湾等地迁徙。这些迁徙轨迹，也都能在琅岐宗祠建筑群中找到相应的参照。而且，从祠堂里，我们还能看出琅岐人走向海外的轨迹，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的。

据记载，清代台湾教谕谢金銮，乾隆年间曾在琅岐衙前村陈燮（四川川东兵备道）家中教馆三年，与翁曾（明代状元翁正春八世孙）是同乡。两人同在琅岐教馆，又同好诗酒山水之乐，于是，经常相约到雁行洲泛舟钓鱼、沽酒唱和。谢金銮生动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与心情：

处芦洲蟹港烟帆繁树之间……海月如昼，
渡桥板相游，诸子牵小舟繁树荫中，买鱼沽酒，
沟灯分照至达旦。大海初阳照耀，波平如镜，雁
鹭鸥凫，上下水际，东潮未至，履沙岸。蛟龙洞
府，乱石高下，皆螺蟹所蚀，玲珑石窖……时海

中读书之乐，真不知人间还有宝贵耳。

看来，100多年前的琅岐岛，就是一座生态旅游岛。今天，我们站在绿色田畴旁，白鹭依然会绕着你翻飞；站在雁行江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时时入眼。但是，未来的琅岐岛，生态是否还能得到这么好的保护？人们似乎变得没有把握起来了。

雁行洲之外，就是已有400多年历史的云龙村的朴树林，还有九龙山和白云山上的万千葱茏。这是一座海岛的生命的本真，也是当代人心灵的追求。我们应当知道，真正的绿色生态家园，首先应当是努力保护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应当是精心呵护温软可人的沙洲湿地，应当是倾心聆听当地流传了千年的故事和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心中的心声！

我们期待一座时刻弥漫着瓜果的清香，飘散着海味的鲜美，起舞着漫天的白鹭，让你时时刻刻沉醉在绿色里的生态之岛，将永远镶嵌在碧波荡漾的中国的闽江口。

嘉者，美也、善也、吉也；登者，上也、进也、成也。嘉登者，琅岐也。



琅岐的味道

林 山

闽江从武夷山脉涵养、生成，沿途收纳溪流泉河，奔流入海。

就在闽江口，闽江遇到琅山的挽留，一心向海的闽江，只好水分左右双流绕行，中间渐渐冲积成洲。被闽江分流拥抱的山和洲，就是闽江口

最大的岛屿——琅岐。

清新的琅岐。



琅岐闽江大桥

从天空俯瞰，琅岐如镶嵌在闽江口的一方碧玉，翡翠满绿。

琅岐岛的西部，称作“芦沙口”。遥想当年，这块闽江下游冲积沙洲，在村落未形成之前是原生态的河口湿地，芦苇茂密、河汊纵横、雁鸥翱翔……每当渔舟唱晚，洲头夜泊，无数渔火映着江水，浮光跃金。不妨读读出生闽江源头崇安的柳永创作的《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只。葭苇萧萧风淅淅。沙汀宿雁破烟飞，溪桥残月和霜白。渐渐分曙色……”也许，他当年四处奔走，谋求前程时，到过这里，睹景伤情，填成此词。确实，芦沙口附近就是“雁行洲”。

闽江的触角伸进琅岐岛，以雁行江的名义，蜿蜒向前，把淡水送到岛内的田园、村落。母亲河伟大啊，她滋润大地，哺育百姓，为琅岐的水稻瓜果和五禽六畜带来生命之水。

琅岐的清新，是上苍赐给的。岛屿的岸线有滩涂、沙滩，是鸟类的天堂，是游鱼的走廊，是蛭蛤螺蟹的天然家园。

琅岐向海这个地方，是个由风刮起来的沙丘，寸草不生。不知什么时候，有一大群迁徙的海鸟，歇脚在这里。鸟群飞走后，一地乱羽和鸟屎。春天，人们惊喜地发现，这里长起一片朴树苗。原来，是饱食朴树果实的鸟群，留下了种子。不知道鸟群是否有意选择这喜光耐阴、喜湿润耐干旱、不畏盐碱的朴树？或者是老天随意安排？反正绿开了。为保护这天然防沙林，乡规民约不许人畜进入，严禁砍伐破坏，同时配上当地风水和鬼神报应之说，效果颇佳，成就一个天人合一的绿色传奇。

清新的琅岐，是天然生态，也是人们用心护理的生态。置身琅岐，行走其间，好一派田园



风光。长形方形的稻田，被田埂黏合。高高低低的田园，盛产瓜果蔬菜。条条河港和湖汊在田园中，如流动的旋律，欢快地奏响田园诗般的清新交响曲。

二

清甜的琅岐。

在琅岐，你会呼吸到非常清甜的空气。陶醉之余，你会突然感到奇怪：这不是在岛上吗？怎么没有那种海岛特有的咸湿气息？

原来，琅岐虽然是东临海洋的岛屿，但它却三面临江，它是被闽江母亲的温暖手臂抱在怀里。

闽江是琅岐的母亲河。作为母亲，她用生命之水哺育了琅岐的万物。作为母亲，她更用人文精神涵养了历代的琅岐人。闽江水带给琅岐的是

绵绵不绝的中原文化，是浓郁而悠久的书香。

琅岐地方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儒风习习，书香盈岛。柳永是否到过琅岐，只是猜想。柳永的同村，约比他晚生百年的朱熹，据说来过琅岐。朱熹在琅岐办紫阳书院，讲学授课。据《清嘉庆十七年重建朱子祠碑记》载：“闽东南滨海所谓海滨邹鲁也，而琅岐一乡，大海之支，其人士尤敦崇古道，守朱子之学，旧有紫阳祠……”那是朱子走后，人们将书院改为紫阳祠，亦称朱子祠。再后来就作为罗峰书院，培养琅岐子弟。

要形象地看到中原文化在琅岐的传承，就去琅岐镇的那条老街走走吧。这里沿街排列着朱、董、江、陈四姓的宗祠。顺路先走进董氏宗祠。来自涿州范阳随王审知入闽的董纯永，是宋太祖钦赐朝奉大夫董宗本的九世孙，于南宋绍兴年间来到琅岐，衍传 41 世。董氏一族功名丰硕、文声



广播。明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黄道周为之撰楹联：“衣冠清节传三世，辞赋声名著两都。”

那朱氏宗祠，大门两侧就镌刻着《朱子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大厅壁镶嵌有朱熹手迹与“忠、义、节、孝”人物石雕，楹联曰：“汉室忠臣旌折槛，理学心源忆考亭。”

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自宋朝以来，琅



琅岐董氏祠堂

岐出过进士 20 多人、中举 30 多人。到琅岐吴庄的林氏宗祠，可以听到“十八把白扇”的文人雅集韵事，而董氏祠堂的楹联“扬我宗风登斯堂能无愧否？绳吾祖武履此地可勿思乎”，颇让人感受到中原文化及其宗祠文化的正能量。

三

鲜美的琅岐。

琅岐是一个独特的江环海抱的河口岛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琅岐的自然物产和乡土人情具有个性化的风味，有别于其他地方。

琅岐出产的大米、番薯、柑橘、西瓜、葡萄、枇杷、甜瓜、莲藕和无公害蔬菜，味道非常甜美；琅岐滩涂的缢蛏、文蛤、红蟳、芦虾、鲈鱼、鳊鱼、花跳鱼、淡水鱼等更是特别鲜美。例如青蟹，是琅岐的精灵，缘于生命繁衍的冲动，青壳中积蓄满腹红膏，华丽转身成了红蟳。琅岐红蟳“好吃”，众所周知，就是源于这里的水土——咸淡活水百般缠绵处。

殊不知，一个特别的地域文化，因此风生水起。沿江而来的中原文化，在这里邂逅临海而生的海洋文化，产生独特的闽都文化。

滨海的琅岐近一半居民在海外，是著名的侨乡。乡愁刻骨铭心的华侨华人，尤其重视家乡的宗祠和祠堂。柳永那阙《归朝欢》正是乡愁柔肠百转的吟唱：“……路遥山远多行役。往来人，只轮双桨，尽是利名客。一望乡关烟水隔。转觉归

心生羽翼。愁云恨雨两牵萦，新春残腊相催逼。岁华都瞬息。浪萍风梗诚何益。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

闽江和东海交汇、冲击，岛屿和大陆相连又间水，形成不同性格的杂交混合，不同思维方式的交锋和包容。

福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潮头浪尖跃进。琅岐，犹如福州的一枚闲章，居然十分平静。清华、北大的学子，在砚池湖，用赛艇，犁开一道道和谐竞争的航线。

开发、投资的竞争，在琅岐之外，悄悄决定着琅岐的发展命运。

——跟香港面积一样大的琅岐，如果运气好一点，“琅岐特区”也许就会载入史册。

——高优农业示范区、现代化蔬菜副食品基地和田园风光特色旅游休闲度假区、集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宜业宜居现代化新城、旅游综合体、中非海洋渔业合作基地、综合性国际港务经济区、自由贸易岛……都如阳光、风和雨一样，接踵拜访琅岐岛。一个个高端设计，在多少人的心头，引起无数的期盼和遐想。

在时代匆匆的脚步声中，在城乡开发建设的滚滚热潮中，在几近全方位全时空的旅游时尚中，在这里，居然还能找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风光，拾到一份难得的宁静和淡定……

于是，又一个鲜美的梦想，悄悄裹住了琅岐。



琅岐万叶葡萄园

幸有青山隔尘嚣

文 净

琅岐岛的山，最高只有 270 多米，与那些高山峻岭相比，不过是几个小土丘。然而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那山很美丽。“琅岐十景”之首，便是“白云观日”。

“白云”，即白云山，琅岐岛最高峰。据说从这里看日出，碧波红球，霞天锦浪，蔚为壮

观。我去的时候已过日出时分，又逢上阴雨天，山上云雾飘腾。热心的当地朋友还是把我们带到观日台，面对云雾左指指，右点点，向我们描述天气晴朗时所能见到的风景。那是闽江与东海的交汇处，江上渔舟，点点如诗，海上帆影，片片如画。岸边青山，水里赤礁，在浪波间隐隐起



伏。海天相接处的几点岛屿，便是马祖列岛，那边的岛上人家，更惹人心绪万端。可惜浮云遮望眼，来得不是时候，当地朋友连表惋惜。

其实，我喜欢眼前的云雾。一座低低的岛中山，竟能这样凝云聚雾，本身就是一道奇观。琅岐岛三面临江，一面向海，下奔的江水与上涌的海水互为激荡，水汽蒸腾飘洒，想来这便是山中多云的奥秘。然而，若不是树木苍郁，植被丰厚，云朵恐怕也大多一飘而过，不会在山上恋恋不去。那天我看到的云雾，浓淡相宜，绕林塞谷，把来来去去的香客游人，衬托得如仙男仙女。以前所见的岛中山，大多岩石裸露，土质硬板，即使有树有林，也多是木麻黄、相思树。这里的树有针叶，也有阔叶，有新林，也有古木，众树交杂，高低错落。这样的清幽世界，自然有助于酿云造雾，也颇能勾留来来往往的云霞。面对眼前的云雾，我在猜，它们从何而来？山岚乎？江雾乎？海云乎？分不清，辨不明。在这里，它们已经融成一体，彼此难分，蔚然而成白云之大观。世之山名为“白云”者，多处高峻之地，200多米高的白云山，我在琅岐岛才第一次见到。

“忽来沧海看红日，恰有青山号白云”。一位湖南人到琅岐做客，登白云山后吟出这样的诗句。此公曾任明代户部尚书，明亡后不仕，以笔墨自娱。那是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距今也有370年了。不管世事如何流转，这里却是青山依旧在，白云常萦绕。岛上人家，多缺柴草木



白云山观日台

料，难得的几片山地，大多经不起几回砍伐，琅岐岛的山缘何常青？去看看龙鼓海边的那片朴树林，或许能明白其中的几分奥秘。那里原是海边的一片沙地，海鸟把带有朴树种子的粪便拉在这里，竟然长出树苗。朴树原是北方的树种，却在海边的沙地上发芽生根，郁然成林。当地村民喜甚爱极，精心呵护，即使是社会失序的动乱年月，这里的树木也毫发无损。这片“海鸟拉出来的森林”，如今已生长着30多种野生植物，占地达40多亩。夏秋时节，成群的海鸟、野鸭栖息其

中，啾啾鸟鸣，悦耳怡心。

横亘琅岐岛中部的九龙山，高度仅次于白云山，却地跨12个自然村，方圆达10多平方公里，无疑是岛上脉系最长的山，古人以“盘结衍迤”状之。入山，一样是树木葱笼，鸟音清越。不时从林间传出的水声，畅快而饱满，闻其音，

的两条溪流是九龙溪与罗溪。那是青山淌出的鲜美乳汁，孕育着山下的一代又一代岛民。

九龙山顶看琅岐，靠东临海的那边，多为山地丘陵，面迎闽江的那边，则是一片平野阔地。稻田、菜地、果园、苗圃、莲池、鱼塘、沟渠、村落，在这里铺排出迷人的田园图景。来的



九龙山天竺寺



便知道这是一座水灵灵的山。山上有个九龙潭，潭上有座“听泉亭”。坐于亭中，泉声盈耳，韵若妙乐。尽管不远处便是江海，江涛海浪的相激之声，此时也被推得远远的。那幽静，是深山里的幽静；那喧哗，也是深山里的喧哗。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九龙山共有18座山峰18道水，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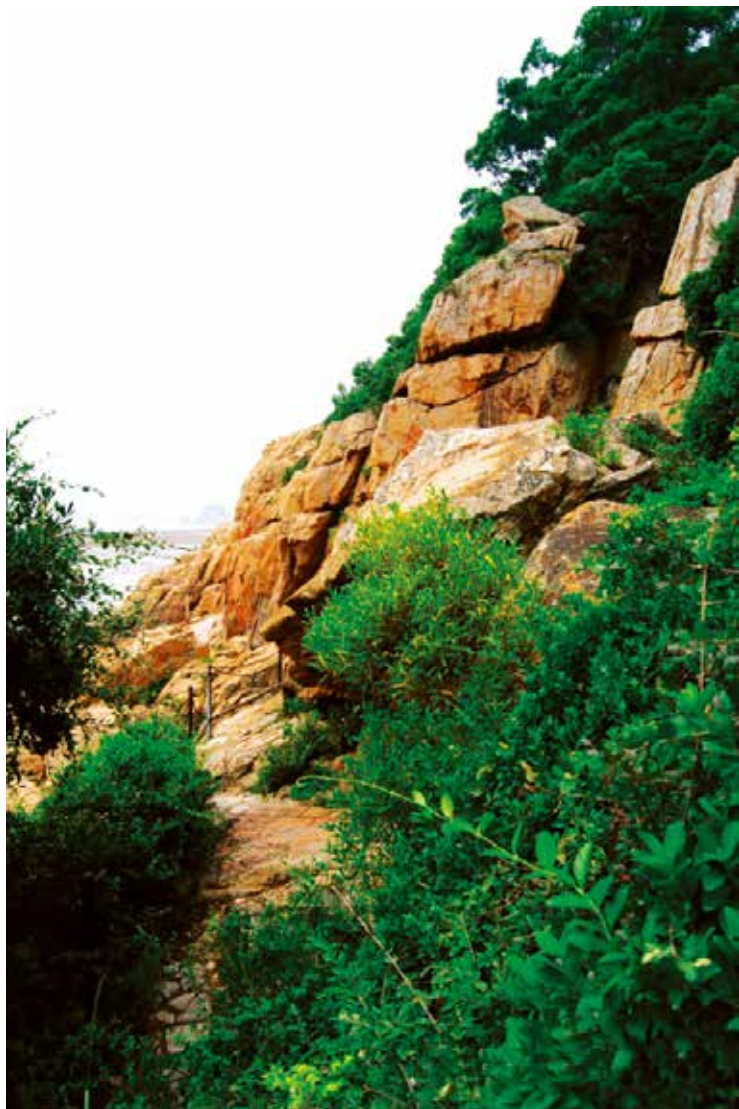
时候，我就从那片田园图景中穿过。这是一块会变魔术的沃土，一年四季不断变换色彩，种稻稻香，栽瓜瓜甜，养鱼鱼肥，培花花艳，从这里出产的番薯、西瓜、葡萄、文蛤、红蟳，都是城里人的抢手货。不过，这样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并非自古就有。据说在唐代以前，琅岐岛不

过是几座兀立水上的小山。想必是美丽的山体要以自己的乳汁哺育成片的土地，于是它敞开胸脯，舒开臂膀，一点点地接纳来自上游送来的泥沙。千里闽江一路亲吻着大地，把泥沙的精华带到下游。江海相激的闽江口，浪急潮卷。正是有了山的深情勾留，眼看就要奔入大海的泥土在这里停了下来，一重重地沉淀，一寸寸地延伸，终于铺成这片宽阔而富庶的岛上平原。

可以肯定，没有那些兀立水上的小山，就不会有如今的琅岐岛。在小山下低伏平铺的琅岐岛平原，却出产了那么多量的鱼米瓜果，那是它以谦卑的姿态，表达对山的仰敬，也以慷慨的回报，表达对山的感恩。

琅岐岛当年的另一片读书佳地，也在山中，那山叫“一条龙”，系九龙山支脉。那座已染上浓浓岁月印痕的古建筑，便是当年的罗峰书院，因院内奉祀朱熹像，亦称朱子祠。土木结构，封火山墙，三进建筑，中有厅堂、厢房、天井、回廊。据说，当年书院大门的两边，还嵌着一对180字的长联，历数琅岐岛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风物景致，辞美句雅，意远气雄。遗留至今的6块明清石碑，似在默默述说书院昔日的荣光。“闽东南滨海所谓海滨邹鲁也，而琅岐一乡，大海之支，其人士尤敦崇

古道。”清嘉庆年间的重建朱子祠碑这样记述。据说在当时，琅岐文风昌炽，罗峰书院为岛上的最高学府，“罗阁书声”朗朗悦耳，吸引了周边乡村的众多学子。岛上的那些来自各地的移民，虽多以种田耕海为生，但传承中原文化血脉的情怀未泯，不少人秉持耕读传家、诗书济世的理念，寄



琅岐龙王洞景区

望子孙尚德效贤、知书识礼。江涛喧耳、海风掀衣的岛乡，哪里是宁静的读书佳地？幸有青山隔尘嚣，山水灵气毓英才。琅岐岛能赢得“明标宦迹，清振科名”的美誉，离不开山的庇荫，山的滋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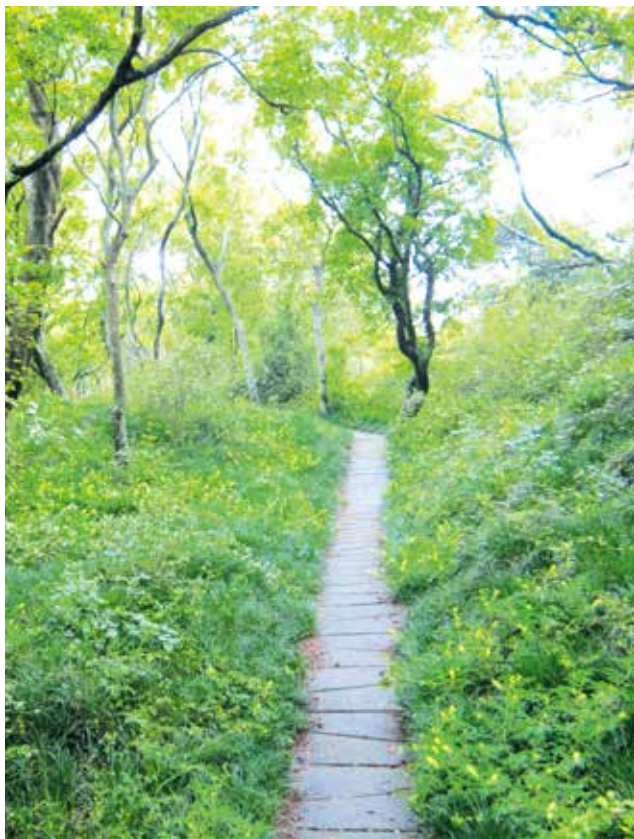
“罗谷深深别有天，万株松里一灯悬。”“山渠分瀑道涓涓，片月窥窗不可关。”“梅柳争春一径斜，团阴浮翠野人家。”“不栽桃李种芝兰，幽谷丛生喜漫看。”古人笔下的这些山味浓浓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这座江海之岛的风情。琅岐岛的

寺观宫庙，也多藏于山中或依山而立。“经室行山鸟，香厨逗涧泉。”如此生动的寺院小景，说的便是琅岐的天竺寺。白云寺旁有片和尚墓，从墓碑上的记述可知，该寺属禅宗曹洞派，住持多由鼓山涌泉寺而来。这里的氛围与气场，似也与鼓山有几分贯通之处。想起一代诗僧寒山的“白云高岫闲”“白云自去来”，便觉得山名“白云”，禅意深深。琅岐的岛民，不少是因避战乱、避官司、避自然灾害、避政治迫害移居而来的。在四围是水的异乡孤岛，他们选择在山上建寺盖庙。



白云寺

深林幽谷之中，缭绕的烟篆与清越的钟磬之声，或许让他们暂时忘去曾经的痛，眼前的苦，重燃起信念的心灯，更加主动地融入这一方水土。当地的书生雅士，还有归乡的仕途失意人，也常常借这里的一角青山养心蓄志，托怀寄傲。有朋自岛外来，邀其登山赏景，入林吟啸，不亦快哉。单是一座白云山，宋元明清四朝，便有无数文人骚客登临歌咏，赋诗留墨。元代诗人董渭隐居白云山的往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所乐道。琅岐的这片山，给登临其间的人们以无尽的精神润泽；腹有诗书的琅岐人，又给这片山不断注入新的文化



琅岐朴树林

因子。因着年复一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不高的山也有了值得仰望的人文高度。

一个秋日的清晨，我在鼓尾山的林荫道上独自漫步。那是临海的一片苍翠的山坡，一幢幢别致的楼房错杂其间，美若仙山之琼阁。山脚下便是海，涨潮时，海浪漫过沙滩直拍岸边的山石。我去的那时，退潮得很远了，平展的沙滩外延数百米远，涛声随之远逝，却有一阵鹧鸪声从山中传来。蓦然想起辛弃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临海的山有多深，声声鹧鸪，又源于哪丛树，哪片岩，哪个洞？不知怎的，琅岐岛的风光，常常会唤起我心底里的某种“似曾相识”的记忆。看到水道纵横、田园肥美的平野，就想起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冲积平原。看到依山临海的鼓尾山度假区，就想到青岛海滨的洋式建筑群。这里的鹧鸪声，又让我想起厦门对岸的金门岛。那里的山也是林幽泉美，让你难以相信曾经的炮火硝烟。我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听到的鹧鸪声，也与这回在琅岐岛听到的一样，把山野幽谷的自然意趣与空寂境界，一声声撒播开来。古人称琅岐之山“盘薄攀积，环以水，其下为壶江，水又环之，若蓬岛”。临海萦水的环境，无疑为这里的山平添了几分秀逸之气。不过，即使没有江海的映衬，这里的山也自有魅力。单是那声声鹧鸪啼，就足以把人们心头的重重幽思勾动。闽江的入海口，竟然也有海涛吵不散、咸风逼不走的鹧鸪声，每想到此，我对琅岐岛的山便多了几分眷恋之情。

咫尺画幅天地宽

檀东铨的扇面作品

郑乃珖



檀东铨，1943年4月生于福建福州，196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曾任福建师大美术学院院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福州市美协副主席。现为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委员、省美术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省陶行知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擅长中国画，尤精于工笔花鸟画，长期授业于著名花鸟画大师郑乃珖先生，在文学、书法、中国画史论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多年来，有百余件作品入选全国美展或发表于《美术》《中国画》等重要学术刊物，多件作品入编《中国现代花鸟全集》等大型画册，并被国务院、中南海紫光阁、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外交部钓鱼台等收藏。先后出版有《工笔花鸟画》《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选集·檀东铨工笔花鸟画集》等15部个人专著和画集。



前些时候，阿铿弟（我习惯于用他在家的小名称呼他）携带数十幅装裱得很精美的扇面作品求教于我，并请我为他这些即将出版的扇面作品题签和写序，我欣然应之。

数十年前，檀东铿是我的邻居，20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向我学习中国画，那时山水、花鸟、工笔、写意都画，后来逐渐转而主攻工笔花鸟画。他对画很着迷，学习很用功，笔不离手又肯动脑筋，且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而进步很快。尤其是近年来，画作日趋成熟精到，观之，真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扇面画作尺幅虽小，要画好却也不易，犹

如写小字，既要端严精微又要气度开张给人宽博之感。阿铿的扇面作品正体现了这样的特色。他的每幅作品都画得很精美，从造型的概括取舍，到用线用色都十分讲究，但却不拘谨；它形体丰秀大方，线条消劲圆隽；放得开，收得住，色彩统一协调又有统一中的小变化。像他的牡丹、芙蓉，花朵都画得硕大、丰满，占据了画面很大的位置，显得轻盈厚实，毫无空薄之感。他的几十幅作品，每一幅都有一种基调，既保持了一幅画色彩的协调，又拉开了画幅与画幅间的距离。前人画扇画多用折枝，这种画法处理不好往往有标本之嫌。阿铿的扇面作品，在突出画面主体时，

注意到主体和环境的联系，注意到借物言情，努力把对象表现得有活力，有诗情画意。因而他的这些扇面之作尺幅虽小，却给人许多画外的遐想，给人余韵无穷的感觉。从他的画作中，我们看到了作者高雅的情趣，看到作者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功力。

出画集，办画展，画作一多，往往难以避免雷同。要克服这点，就要注意收集素材，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就要注意不同的立意取材，注意运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阿铿的扇面作品直接来自于生活，像《田园风味》中的南瓜花，就是他上

课带学生到田园中写生的积累。其余像杜鹃、马蹄莲、芙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写生稿本。正因为来自于生活，所以像木芙蓉之类的花，他画得绝不同于画本，而是画出了自家的风格，且显得风姿绰约、体态万端。

他平时学习勤奋，空余的时间抓得很紧，一般人当了行政领导就“脱产”了，可是他没有放弃专业。他注意向传统、向前人和当代的书画家吸取营养，学习多样化的表现手法。他的作品以工笔花鸟为主，却能兼工写意和山水。他注意到了工与写、双勾与没骨、白描与重彩等多样花鸟



画表现手法的结合运用，且结合得十分自然。此外，为了拉开画作的距离，他还注意到构图的变化。他的扇面作品，有的画材满纸，枝繁叶茂，有的画面空灵，仅幽花数朵。但不论是繁是简，他的构图都处理得跌宕多变，奇正相生。画材多的画，密而通灵，风姿依然秀美；画材少的画，少而不空，空白处皆成画境。古人云：行成于思。一幅画要画好，笔墨的基本功是需要的，但还要有灵感，要善于用脑筋去思考，有了创作的灵感，三思而后行，才会把作品画得更有深度，更有感染力。

和阿铿弟相识多年，他比较内向，与人闲聊，不善辞令，但画画办事却肯动脑筋，会动脑筋。他的这些扇面小品都画得很精美，无疑动了脑筋。他说他绘画重在表现自己的情思，重在立意，而不在于手法上的标新立异，只要立意确定后，为了突出主题，表现画作的意境，什么手法，不论新的、传统的，他都注意汲取。正因为他在创作中强调了言情，注重表现思想境界，因而他的作品自然渗透着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显得不同凡响。

阿铿弟年轻时是念中文专业的，他对诗歌



散文尤为嗜好，也写得一手好诗文。这些文学修养赋予他的作品较多的内涵，再加上他书法的素养，使他的这些作品情调优雅，具有浓厚的书卷气。我想这样的画作一定会打动观者，会使观者

爱不释手。当这本扇面集问世之时，当书画爱好者们捧读画册中的尺咫小品时，作者的心情无疑是兴奋的，而作为我——作者的老师，为学生的成长，将和作者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